



记忆 118 期
2014 年 8 月 31 日

目 录

【专 稿】

郭罗基 周扬奉命按名单抓右派

启 之 “文革思维”在今天——目的与手段

【上海文革】

李 迅 上海文革中的另类思潮——来自边缘的思索

【口述】

袁庾华口述 李素立采写并整理 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一）
——原河南二七公社“火指”负责人袁庾华专访

【评 论】

津 平 年龄最大的右派——从叶恭绰到冒广生

【学苑新语】

阿 秋 革命万岁，革命死了——评《八九点钟的太阳》

【述 往】

禾 川 是否值得经历的生活——李黎黎之死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三）——男生女生

安希孟 安希孟回忆录（二）——困难时期

【资 料】

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一）

【版权声明】

【专稿】

周扬奉命按名单抓右派

郭罗基

1957年，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分子”，隔三差五便有轰动消息。当时主其事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周扬。后来文艺界对周扬自然怨言声声、怒气冲冲。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中，陆定一和周扬是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扬为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出力甚多，但人们对他在1957年的所作所为仍不能原谅。1957年的“右派”

丁玲等人变成了“左派”，而周扬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却变成了“右派”，前者对后者依然耿耿于怀。

周扬是代人受过。

我曾听到周扬透露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个重要情节，公诸于众，以存史实。

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是我所在的第三组的召集人。那时他已年逾古稀，而且因患肺癌动过大手术，但主持会议，带头发言，



周扬（1908-1989）未尝懈怠。有一天，他没有来。次日，问以故。他说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去了（他弄错了，不是追悼会。后来了解，是中组部举行的一个仪式，宣布为冯雪峰的右派问题改正，恢复党籍。追悼会是在这之后举行的）。同去的人说，他一进会场就痛哭流涕。他自己说，见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

1975年，周扬刚从牢里放出来，独自一人，坐公交车从西到东，横跨北京城，去看望癌症晚期的冯雪峰。看到雪峰穷困潦倒，周扬返回家中，向夫人苏灵扬要了三百元钱，再次送去。雪峰十分感动，写了一篇寓言《两只锦鸡》，说：两只

锦鸡各自拔出一根最美丽的羽毛，送给对方。雪峰行将就木，唯念党籍尚未恢复。周扬回家后连夜给毛主席写信，代诉衷情。而这时他本人的党籍也尚未恢复。

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

冯雪峰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是“在劫难逃”。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宣布：“冯雪峰是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第二天，冯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文化部的通知：“你处报来的冯雪峰的材料，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本没有上报冯雪峰的材料，而是四个月以后补报的。先在报上点名，然后宣布决定，而决定所依据的材料四个月以后才凑齐。处理的程序完全是颠倒的。

名单上的人，有的周扬也想保护，例如漫画家华君武。他说：华君武出身贫苦，到过延安，言论有错，还不是右派。遭毛严厉斥责：“华君武不是右派，你周扬就是右派！”

周扬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倒并没有完全归罪于这个名单，说：“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陆定一曾自责：“中宣部的任务无非就是整人，今天整了这个，明天整那个。”

“胡风分子”贾植芳吃过周扬的苦头，但他坦言：“如果丁玲、陈企霞当权，可能比周扬还周扬。”

以前只知道凑“指标”、按“百分比”抓右派，居然还有按实实在在的预定的“名单”抓右派！而且，没有材料就翻老账。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规模的翻老账运动。

我们第三组议论纷纷，有人问：“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周扬说不知道。



冯雪峰(1903-1976)

有几位自作聪明的同志说：“一定是江青那个坏女人提供的。”

我说：“不一定。江青不过是看家狗一条！”后来审判“四人帮”时，江青果然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我相信周扬的为人，但所说的这个重大情节没有证据。我私下对周扬说：“这叫死无对证。”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会怀疑他推卸责任。

他说：“你去看看 1958 年 1 月份的《文艺报》。”

我有印象，说：“好像专门登了几位作家在延安时代写的作品。”

“那就是为了翻老账。你再仔细看看‘编者按语’，是不是主席的话？”

我把 1958 年 1 月 26 日出的《文艺报》第 2 期找了出来，“编者按语”的题目叫做《再批判》。确实，那口气非毛莫属，印证了周扬所说的情节。

后来我又从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第 7 册找到了这个“编者按语”，那就是铁证了。注解中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 2 期出一个特辑。《文艺报》拟的按语，毛泽东不甚满意，改写和加写了许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括号中的文字就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段落：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是在 1941 年发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题为《在医院中》，在重庆的《文艺阵地》上重新发表。

在延安时，两位武夫贺龙、王震曾狠狠地批评湖南老乡丁玲。周扬说，当时毛主席保了丁玲。而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还是经他老人家修改、润色的。

“编者按语”继续写道：

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

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烽、艾青在敌人监狱里也有过自首行为。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15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提起了他们15年前发表出来的这一批毒草。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重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两句陶渊明的《移居》诗，从此就有了新的含义。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赏”，经批判家们“疑义相与析”，必定是“毒草”，对作者则发出“打倒”的信号。故流行的成语词典都要特别注明：“现常用于贬义”。隐逸世外的陶渊明，决没有想到他的诗句会成为毛泽东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请继续看“编者按语”：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

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章对于我们有些什么教育作用，毒草何以变成肥料，我们发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张光年、马铁丁、严文井、冯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个批判对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后面。当然，这个批判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文艺界利用这个材料，在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给读者以更多的帮助。

马铁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别人的人，后来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

丁玲、陈企霞早在反右派之前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大鸣大放中噤若寒蝉，为什么还要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因为又一次被列入毛给周扬的名单，“在劫难逃”。由此可见周扬所言非虚。



丁玲（1904—1986）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发配到北大荒，在农场当文化教员（中），图为与部分教员、学员合影。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说明，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名单？

起初，毛泽东确有整风的诚意，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后来形势急转直下，矛头指向帮助党整风的人。李维汉的回忆录提供了关键时刻的重要材料：“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意见可以说是切中时弊。毛泽东同志……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①

罗隆基的原话，是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知识分子“翘尾巴”了。储安平“向老和尚提

^①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1-834页。

点意见”，批评“党天下”，更是“尾巴”翘上天了。工人、农民都没有“尾巴”，就是知识分子有“尾巴”。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尾巴”，观察是很细致的。什么叫“翘尾巴”？狗才“翘尾巴”，“翘尾巴”就是不听主人使唤。发动反右派运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加掩饰地讲是为了整一整知识分子“翘尾巴”。毛泽东“下定反右派的决心”的那篇文章就是这样讲的：“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谆谆教导



陈企霞(1913—1988)

总是提醒人们注意“尾巴”！所以平时不“翘尾巴”的，即使放出了右派言论，也可以保护过关，如黄炎培、胡子婴。^②平时“翘尾巴”的，即使没有右派言论也要戴上帽子，恰如周扬所说的“在劫难逃”。

丁玲等人，政治上一点不“右”，反右运动把“左派”打成“右派”，确实是搞错了。坏就坏在他们常常向党“翘尾巴”，故打成“反党集团”之后仍不罢休，没有“右派言论”也要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右派分子”帽子一戴，就像套上了紧箍咒，不翘“尾巴”了；摘了“右派分子”帽子，非但不翘“尾巴”，反而对党感恩戴德了，于是以“优秀共产党员”告终。不是说丁玲写过“自首书”吗？那也一笔勾销了。

从毛泽东在“编者按语”中所写的可以看出，要“翻延安的老账”完全发自内心，决非“坏女人”江青唆使。毛泽东交给周扬的那个名单，其中一批老作家从延安时代起就是属于“翘尾巴”一族。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7页。

^② 《回忆与研究》下，第834页。

【专稿】

“文革思维”在今天

——目的与手段

启之

人们常常担心，文革会重演。其实，本初意义上的文革不可能重演，因为它没有了发动者和领导者，环境和条件也变了。真正能够重演，并且正在我们身边上演的是文革的思想观点和看问题的方法。我称之为“文革思维”。

我所说的“文革思维”，不仅是在文革中产生的，或者只有文革才有的，而是在文革中表现得最充分，运用最广泛，深入了人心，达到了顶峰，走到了极端。比如人们常说的“五子登科”（套框子、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挖根子）早就有了，但是在文革中发展到极致，成了大批判必备的武器，两派斗争的基本手法。因此，我把“五子登科”列入“文革思维”。

“文革思维”很多，在当下的语境中，有的可以谈，有的不可以谈。这里谈的是可以谈，且对社会上影响较大的。先谈“目的与手段”。

目的与手段的问题，是个知易行难的事。当年在土默川插队的时候，冬闲没事，知青聚在一起“灰撒”，说起农民之苦，干部之横，政策之苛。大家说来说去，似乎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只有掌权一条路。而要有权，就得当官，至少得当到旗委书记；而要当官，就得入党；要入党，就得说空话套话假话；光说还不行，还得干。可你执行政策，就免不了损害农民利益。这个是坎。

华子发表高见：“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说假话，做坏事，就是困难，如果我们在说和做之前，想到有一天我们能解民于倒悬，这个困难就会被战胜。什么叫忍辱负重，为人民说假话做坏事才是忍辱负重啊！”

华子的话音刚落，一直抽闷烟的老三拍拍屁股，跳下炕，指着华子：等你战胜了困难，当上了旗委书记，坏事也做了一大堆。高粱面捏毬，你跟现在的当官的有什么两样？还改变面貌呢，毬也改不了！

为了善的目的，是否可以用恶的手段？反过来说，如果用了恶的手段，还能不能达到善的目的？

一、陈伯达的造假：为了善，可以恶

为了消灭共产党，国民党从造谣诬蔑到武装围剿，无所不用其极。这方面大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这里，我说说另一派的做法。

1946年，陈伯达写了一本《中国四大家族》。据称，此书是一严肃的学术著作，其以严谨的考证，客观的分析，揭露了国府高层的贪腐真相。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数据，缀之以大量注释，指控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以权谋私，官商兼顾，其产业遍及房地产、金融业、工业、农业、商业和新闻出版等各领域。他们的资本和存款，至少达200亿美元。此书甫一竣稿，立即由《解放日报》连载，同时推出单行本。其所到之处，如摧枯拉朽，使人心丕变，国民政府的合法性遭到置疑，“蒋宋孔陈”掠夺民脂民膏，成为历史铁案。

五十年后，人们才知道，此书以学术之名，行宣传之实。其失实错谬，不下百处。所谓200亿美元的资产和存款，端赖陈伯达的移花接木之术——他将所有与蒋宋孔陈的姓氏名讳有点关系的公私工商产业都归到这四人的名下。陈伯达对陈果夫、陈立夫的栽赃诬陷最为明显。在国民党里，二陈的清廉是有名的。五十年代初，陈果夫在香港看病没钱乘车，是蒋介石拨款救急。陈立夫在台湾受排挤，远走美国，为谋生计，自办鸡场，一千刀的启动资金，还是跟孔家借的。

然而，四大家族的故事深入人心，这本书成了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尽管如今两岸关系缓和，资讯开放，陈氏兄弟之清廉已经为人所知，但陈伯达的欺世骗人却并没有受到多少非议。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实行特务统治，吏治败坏，贪腐成风，这样的政权应该打倒。陈伯达此书为打倒国民党立了功。

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清华井冈山第一把手蒯大富有一个《三十六条权经》，第三十一条是：“……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头脑是理性，是利益得失的算计。良心是道德，是人我关系之衡量。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说明了蒯大富确实修炼到了撒谎骗人而色不变，

同学死于前而目不瞬的境界。

政治斗争不讲诚信，只讲成败。陈伯达、蒯大富是按常理出牌，这个“常理”就是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可以不择手段。目的的崇高，掩盖了手段的丑恶。为了善，可以恶。为了大善，可以大恶。这个不成文的传统，或许跟老大哥的影响有关。苏联契卡主要领导人拉齐斯有过这样的经典论述：“我们可以无所不做，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批举起利剑不是为了奴役和压迫他人。”“我们的道德是新的，我们的人道是绝对的，因为它是以消灭任何剥削和暴力的崇高力量为基础的。”^①

二、邓拓的遗言：为了善，接受恶

1966年5月17日夜，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邓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中共高官。

因为写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他与吴晗、廖沫沙成了第一批被抛到政治祭坛上的牺牲。他的书被定为毒草，他本人成了黑帮。5月16日，党报发表戚本禹的诬陷之文，其中有这么一句：“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无理可讲，无法可想，在举国上下愤怒讨伐、彻底清算的声浪之中，邓拓选择了死。在“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之前，他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②

政治运动中，被冤枉受迫害的共产党人，常有这种悲极痛极又愚极的表态。

^① 闻一：《契卡的“十字军讨伐”》，《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

^② 袁鹰：《玉碎》，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三，页128，华夏出版社，1986。

从这个表态里，隐约可见整个时代对目的和手段的理解——革命是至高至伟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污辱我，诬陷我，冤枉我，折磨我。总之，无论用什么恶劣的方法对待我，我都甘之如饴。也就是说，只要为了善，恶的手段也不再成其为恶。如果革命需要我使用这些手段对待别人，别人也应该像我一样。

其实，延安整风早就奉行这个逻辑了，辛辛苦苦整了两年，整出个“特务如麻”，自杀者有之，疯颠者有之，逃跑者有之，革命受了大损失。可主持整风的，既不给人家平反，也不给人家道歉。最好的表示也就是在台上给大家敬个礼，敬了礼还要求受害的人还礼。^①因为人家有底气——我们是干革命，革命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要交学费的。

看来，目的一旦跟崇高联系起来，就有了法律的豁免权，道德的挡箭牌，非人道的通行证。用什么手段，良心管不着，人情管不到。

三、江青的辩解：权力因目的而免责

1980年，公审“四人帮”时，法庭宣布江青犯有诬告陷害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罪等七项罪。江青辩解：“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在江青看来，因为我是按照善的指示而工作的，所以，我的七宗罪就不再是罪，我的恶，也就成了善。

韦君宜在“肃反”时，受上级之命，把一同事当成特务。整了几个月之后，上边说话了，搞错了。韦君宜向被整的人“口头道了歉，而当时有些和我一样干这种工作的干部，因为我向人道歉还极为不满，说我们那么干是积极为革命的，不应道歉。”^②

整错了而理直气壮，其心理依据是，是领导让我整人的，整错了，是领导的事，跟我没关系。

曾彦修在《九十自励》中说：“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平生未整人”。大多

^① 毛延安道歉，我给你敬礼，你就要还礼。倘若我敬礼，你不还礼，那我的手就放不下来呀！（韦君宜《思痛录》，页308）。

^② 韦君宜：《思痛录》页25。

数整人的人，没有他这种心情；他们理直气壮，青春无悔。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高海林是“牛棚”的监管者，虐待殴打老师毫无手软。为了逼迫杨人梗承认莫须有的“历史问题”，他半夜三更在断崖边上开杨的批斗会，威胁把老先生推到断崖下摔死。历史系学生聂玉海吊打夏应元老师，几乎致死，且大煽周一良的耳光。历史系的青年教师丁则勤诬陷周一良的论文《乞活考》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并且当众殴打学兄郝斌。^①文革后，86岁的老人周一良向他们喊话，“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此三人置若罔闻。他们的理由恐怕跟韦君宜的同事一样。八十年代，清理“三种人”，被清者想不通：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有错吗？

在这里，目的被替换为上级、领导、党中央、毛主席，它们被一体化，被合二为一。崇高伟大正义与权力划了等号。因此，上级、领导也就成了消邪解恶之宝。简言之，权力就是目的，就是善。因此，权力可以免责。

有了这一条，厚黑、陷人于罪、反复无常、言而无信、不认错、不道歉，等等恶行就都堂而皇之地摆上了桌面。

四、徐明清的冤案：文革思维薪尽火传

目的与手段一次又一次的分裂，腐蚀了那场横扫全球，激荡百年的革命运动。终于，在最后一位“世界革命领袖”停止呼吸之后，他的后继者改变了航船的方向。但是目的与手段并没有因为政治的转向而携手并肩，它们仍旧像往日一样各行其事。

1976年10月，正在为打倒四人帮而欢欣鼓舞的徐明清，迎来了三年的牢狱之灾——江青专案组将她秘密逮捕，逼她写材料，证明江青是叛徒。这位二十年代就投身革命的老干部告诉专案组，自己不了解情况，不能写。专案组斥责她：“江青这么大的罪人，你包庇她！”此后，专案组拿出逼供手段，不让徐睡觉，三个月后，神智不清的徐明清，按照专案组的口授，写了证明材料。

这份材料被收入中共中央1977年3月6日下发的十号文件——《关于王洪

^① 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台湾大块，2013年。高海林一事，见《断崖夜斗杨人梗》等章节；聂玉海一事，见页123，137页；丁则勤一事，见页94，167。

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附件中：“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隐瞒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做假证明，钻进党内。”

徐明清并没有因此而从宽。材料写毕，她就被关进秦城，罪名是“叛徒”。

搞清江青的罪状以公之于众，为了这个正大光明的目的，专案组就大搞逼供信。“江青这么大的罪人，你包庇她！”这里面的逻辑是：你不为江青加罪，就是包庇。陈伯达写《中国四大家族》，专案组诬陷上至刘少奇，下至林昭、遇罗克，用的也是这个逻辑。

三年后，几乎精神分裂的徐明清被无罪释放，只因为胡耀邦在高检说了这样一段话：“四人帮粉碎之后，我们还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紧放。”胡一口气点了二十多人的名字，徐明清在其中。^①粉碎四人帮是政治事件，左的那一套不会因为拨乱反正而自动消失。

今有骁勇敢为之士，于万马齐喑之时，高举“勿忘文革，汲取教训”之大旗，控诉文革首恶，揭露老兵暴行，其言唤醒人心，其文鬼神同泣。但是，如果他们一边以权威自居，以“公知”自命，一边以“五子登科”是求，唯“公众人物”是问，那么，他能汲取到的是什么？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曾几何时，这段语录人人耳熟能详。但是，为什么一边高喊“务必充分注意”，一边抄家打人，残害同胞？答案只有一个：长期以来，我们把政策/策略与目的/理想看成了两种不相干的东西。政策以功利为依归，策略以实用为原则。

2014-5-27

于北京之北

^① 徐明清：《明清岁月——为留清白在人间》，页188—196，自印书，2001年9月。

【上海文革】

上海文革中的另类思潮

——来自边缘的思索

李 逊

“共向东”呼唤共产党员的执政意识

1967年6月30日，中共建党纪念日7月1日的前一天，上海主要街道出现一批传单：《致共产党员的一封公开信》，下面的署名是“共向东”。这个名字的含义一目了然：“共产党员心向毛泽东”，作者肯定是共产党员。自一月夺权以来，被“造反”压抑了半年多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意识，在这份传单中重新被提起。

传单的撰写者，是市革会宣传组的四名共产党员：胡志宏、闵晓思、朱根富、吴敦宏，文革前都是市委宣传系统的干部。文革开始后，从北京红卫兵南下冲击上海市委，到徐景贤率写作班集体造反，他们对文革始终不理解。但毛泽东号召干部投入和支持文革，大势所趋，他们后来也加入了各自单位的机关干部造反组织“机关联络站”。一月夺权后，市革会成立，他们作为机关联络站的原机关干部，成为市革会政宣组工作人员。闵晓思是政宣组长，胡志宏是政宣组下的出版小组组长，朱根富在政宣组下的简报小组，吴敦宏在政宣组下的文化组。但是，即使进入市革会工作，他们对文革的怀疑还是没有消除。他们看不惯造反派，尤其一些进入市革会工作的造反派。他们觉得这些造反派随心所欲，无视规则，拉山头，搞派性，争权力。闵孝思等经常在一起议论这些现象。他们虽不敢怀疑文革，但对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却有怀疑，尤其对文革将共产党员边缘化有怀疑：“除了我们还在考虑关心这些党员之外，市革会中不知还有谁在考虑？他们上台以后怎么还会考虑这些党员呢？”^①

不过，他们认为当前的乱是暂时的，夺权后总会恢复秩序，局势不会任造反

^①转引自《把共向东的黑话拿出来示众》，文艺战报1967年12月16日，上海《文艺战报》编辑部编辑；以及金光耀、笔者2012年12月21日对闵孝思的访谈。本节内容，全部引自这个访谈；共向东的9篇文章，全部为闵孝思提供。

派长久控制，以后终究还是会再依靠共产党员的：

基层造反派组织队伍复杂，将来还是要共产党员起来。

造反派掌权支持不能久，总是要党员真正起来，才能把工作搞好。

1967年6月3日，张春桥传达毛泽东暂不恢复党的活动的讲话，提到党员作用：“我这一次在中央，正式向主席请示过党组织是不是恢复活动的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党，很多党员，这些年来脱离群众太厉害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党可以得到改造。在目前恢复活动，不好，因为群众还没有这个要求。恢复了，他们也不能起战斗的领导的作用。因此，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半年以后再说。在这里，我就向上海所有的共产党员，正式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个意见。在半年的过程里边，我们想，所有的共产党员同志，应该像我们以前说过的，不要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员。”^①张春桥的这个讲话，让一些共产党员重又感到了自己的党员身份。闵孝思他们觉得，是呼吁共产党员挺身而出的时候了，组织生活不恢复，党员串连活动应该是被允许的。他们决定，写传单向全市共产党员呼吁：不要消沉，要站出来投入文革。6月底，闵孝思写出了底稿，由胡志宏在此基础上，重新起草；题目定为《致全市共产党员的一封公开信》，署名“共向东”。朱根富拿到人民美术出版社打印了一千份。6月30日晚上下班后，大家和宣传系统的其他党员去淮海路、南京路、外滩等主要街道张贴，还刷了大标语。选6月30日这个日子，是因为第二天7月1日就是中共建党纪念日、“党的生日”，传单所署日期就是7月1日。

这份传单的主要内容是呼吁共产党员要“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建立新的功勋”；不要因为别人不准自己造反就消沉，不要怕“不准革命，不准造反”的“假洋鬼子”；“革命，是共产党员的天职，只要人活着，就要革命，这是用不到谁批准的”；不要因为“对造反派有的做法看不惯，不服气，于是自己也就冷眼旁观，甩手不干”。传单表达对造反派打、砸、抢、随意抄家抓人以及山头主义、风头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为的不满，呼吁党员不要参与。传单认为，党的组织生活只是“目前暂时不恢复，是由于形势的需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对每个

^①《张春桥同志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1967年6月3日，载于《学习文件》。这份《学习文件》没有署名编印单位和日期，但看编排和印刷，应该是市革会在1967年6月编印的。

共产党员最严峻的党性考验”。^①传单强调共产党员的身份意识，在号召共产党员积极投入文革的同时，也使人在字里行间感觉出对造反派的批评，尤其能够感觉这些共产党员随时准备重回主流政治的执政意识。

以后，他们又继续撰写了15份传单；连同第一份，共16份传单。打印并张贴出来的有9份：

1. 《致全市共产党员的一封公开信》，1967年7月1日。
2. 《共产党员行动起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给全市共产党员的第二封公开信》，1967年8月2日。
3. 《关于正确贯彻“文攻武卫”的紧急呼吁》，1967年8月19日。
4. 《革命群众行动起来，坚决制止武斗歪风》，1967年8月28日。
5. 《共产党员要争当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给全市共产党员的第三封公开信》，1967年8月30日。
6. 《革命群众行动起来，坚决取缔宣传品“自由市场”》1967年9月19日。
7. 《极“左”思潮剖析》，1967年9月25日。
8. 《共产党员永远要做革命人》，1967年10月17日。
9. 《共产党员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②

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共向东”觉得，是时候把党员串连起来，为恢复党组织生活作准备了。1967年11月19日上午，“共向东”联系了宣传系统400多个共产党员，在襄阳南路上的襄阳小学召开大会。会议名称是“共产党员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会”，所有活动都是公开的。

“共向东”的活动引起游雪涛关注，写成情况报张春桥。11月24日，市革会政宣组和市委宣传部的造反派，以开会为名，将“共向东”的4人以及一名原市委宣传部干部，由“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艺司”）负责人刘军一指挥，抓到红旗电影制片厂（原海燕电影制片厂）关押。刘军一指使手下毒打他们。胡志宏被打得口吐鲜血；闵孝思被打得胸部受伤，小便失禁，还曾被打得昏死过去；朱根富被打得鼻青脸肿。一个“共向东反革命集团”被揪出，全

①以上引文均引自共向东《致全市共产党员的一封公开信》，1967年7月1日。

②闵孝思向笔者提供了其中8份的复印件，缺第9份传单及其撰写日期。

市五百多共产党员、包括一些与“共向东”观点相同的非党员受到牵连。其中约一百多人被关押遭毒打。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赵福昌，曾经参加过“共向东”的活动。被抓后不但遭打，还被搞了一次假枪毙。一位怀孕妇女被打得流产。许多人因遭毒打，落下毛病，甚至被逼疯。^①朱根富等人被赶去干校，被多次审查。

张春桥始终怀疑“共向东”后面有人指使，一定要揪出“黑后台”。胡志宏是从上海警备区部队转业的，于是追查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与“共向东”的关系；吴敦宏文革前是市委宣传部的机要秘书，于是又查原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是否与“共向东”有联系。^②“共向东”几次被立案，1971年更被立为全市10个“反革命大案”之一。

文革前，作为执政党成员的共产党员，是个非常优越的政治身份。除了知名人士或代表性人物，以及技术、业务人员，不是党员很难进入市、区、县、局、公司等党政科层。即使在基层工厂，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不会只是普通工人。他们通常起码担任生产组长、工会小组长等社会职务。而每周一次的“党组织生活”，更是强调党员身份的神圣仪式，将共产党员和普通老百姓从心理和组织活动加以区分。加上每次政治运动，每个中央决策，都是首先向党员传达，然后再向群众传达，党员比群众有更早的信息权。这一系列刻意的政治待遇分级，使得即使是普通党员，都有一种光荣感、优越感和执政意识。1967年一月夺权后，严密的基层党组织瘫痪，党的各级委员会被革委会替代，各级党组织停止活动。运动初期党员又大多参加保守派，“党员”成为“老保”的代名词。原来在各单位都是政治精英的共产党员被普遍边缘化，“革命造反派”成为更响亮的政治名分，政治地位超过了党员。昔日因党员身份而处处比别人优越的党员，现在成为最普通的群众；甚至因为曾经参加过老保组织，比普通群众还不如。而定期的“组织生活”被取消，更令许多党员失去了归属感。

“共向东”呼唤共产党员的身份意识，呼吁党员投入文革，参与文革，这是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执政意识的恢复。“共向东”不甘共产党员被文革边缘化，他们要唤起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恢复文革前共产党员在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和主导地位。这使造反派意识到自己非党员身份掌权的合法性危机，而他们批判“共向东”的核心，也正是说“共向东”企图夺文革的权。

^①1978年7月27日“贯彻中央23号文件，控诉“四人帮”罪行大会”闵孝思的发言稿，闵孝思提供。

^②同上。

“东方论坛”反对否定一切的批判

“何是”，本名何志强，当时是上海锅炉厂设计科的技术员。毕业于中专的上海机械学校，共青团员，1956年被分配进上海锅炉厂，担任技术员；1963年被评为“上海市五好职工”。何是也可算是“老造反”，1966年安亭事件之前，便已参加厂里的造反队，不过只是普通的造反队员。

何是对文革强势话语式的蛮横批判始终很有看法，反感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觉得姚文元强词夺理，以势压人。他尤其反感文章中的一段话：“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那末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他觉得，如果按这样的推论，那么，老百姓如果有冤，就不得申诉了，申诉就成了敌对阶级了？1967年2月，他写出针对姚文元文章：《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看姚文元》，文章以文革批判“走资派”之矛，攻姚文元文章之盾，提出按姚文元这样的说法，就没有走资派压制群众之一说了；姚文元在文革前夕写这样不准群众造反的文章，是为走资派说话。3月的一天，何是将文章抄出，署名“政治清道夫何是”，张贴到南京路上永安公司的走廊里。“何是”这个笔名，取自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一段话：“‘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取名“政治清道夫”，蕴含着将姚文元看作政治垃圾的鄙视。文章贴出后，没有招来麻烦，当时正是一月夺权混乱之际，大字报很快被其它大字报覆盖。

1967年7月，何是成立了“东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批判学会”，简称“东方学会”，引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一句话作为《宣言书》内容：“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对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1966年10月，又出钢板刻写油印本的《东方论坛》，在上海锅炉厂的厂区以及上海南京路等闹市区散发；有的文章还抄成大字报，在南京路闹市区张贴。说是“东方学会”，其实这个学会只有何是自己一人，写文章，刻写钢板蜡纸，抄写大字报，散发和张贴文章，都是他一个人干。何性格比较内向，平时有了想法也不多和周围人商讨，只是自己写成文章。

何是的油印不定刊《东方论坛》，到1967年12月底，共出十二期。中心内容就是对否定一切的文革式批判的批判。尤其《论“吃小亏，占大便宜”》、《造

“忘我”的反》、《论“我”》等文章，更是对那种强权式批判的不屑，即使这些批判是指向刘少奇的。刘少奇曾批评一些人爱占小便宜怕吃亏，说不怕吃亏的人，最后是占便宜的。196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任立新的文章，将刘少奇的这些话总结为“吃小亏占大便宜”，说“‘吃亏’，‘占便宜’等等，本来就是资产阶级交易所里的行话，只有从投机商的嘴里才吐得出来的”。何是读到这样的论述，非常反感，认为太武断。他写出《论“吃小亏，占大便宜”——兼与任立新同志商榷》，认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考虑到“吃亏”和“占便宜”，是人之常情；何况毛主席的文章中也时有提到这两个词，毛主席而且说过“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这篇文章何是写得比较隐晦，是以批判刘少奇的话语，实际批判空洞的政治说教。而在他1966年11月24日写的题为《造“忘我”的反》中，他的意思更清楚：

大“我”是由小“我”们构成的，大“我”不能丢，小“我”当然不可丢，要是都丢掉了小“我”，还有什么大“我”呢？

他还指出，那些成天号召大家“忘我”的人，正是等着“你们都中了毒，便出来一口把你咬死”。^①在另一篇《也评“右派翻天”》中，何是的批判矛头更是指向新的当权者：

有的人阶级地位变了，由被统治阶级变成了统治阶级，但是剥削思想的影响没有改变，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根据条件齐全，于是他的思想就必然打上新兴资产阶级烙印，自觉与不自觉地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俘虏，由以前的真正左派变成自以为是的“左派”，实际上，“左派”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这才是最危险的“右派翻天”，因此必须对这些人大喝一声，是清醒的时候了！

何是还在另一篇题为《也评“压迫”》的文章中批判了文革中因自身地位变化，重蹈以权力压制不同声音的现象：

谁要是不再感到资产阶级压迫，觉得自身已经完全解放，那就意味着他已经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开始压迫无产阶级了。这是昔日保守派的教训，也是今日造反派的借鉴。

①. 不过，何是后来回忆，虽然对姚文元有看法，但是对张春桥，他那时却没有怀疑。

又是游雪涛，发现了何是的作为。他将何是的文章摘编进他的《扫雷演示文稿》，还派人打入何是工作的上海锅炉厂。当时此厂有两派，何是参加的一派简称“总部”，何是始终只是普通成员。游雪涛派人参加“总部”的会议，写出关于“东方学会”的情况报张春桥。虽然“东方学会”实际只是何是一人的“学会”，而且游雪涛派去的人也没有接触过何是，但报告还是将“东方学会”说成是“总部”下面的一个组织。张春桥在游雪涛报的情况上批示：看来这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应该组织力量，发动群众，展开批判。张春桥要王洪文关注此事。^①

1968年2月18日，何是被关押；3月9日，王洪文和王承龙去上海锅炉厂召开大型座谈会，连续几天发动全厂职工“揭盖子”，批斗何是。自3月11日第108期起，《工人造反报》连续四期整版刊登批判何是的文章，说何是“疯狂地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翻案，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取名“政治清道夫”，就是“要为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还将上海锅炉厂两派长期对立归咎于何是。尽管何是始终只是一人活动，但还是硬被说成是一个“反革命小集团”，以此为由，除何是外又抓了2人，其中一人是“总部”的头头；“隔离”9人，办“学习班”27人；这些人全部被抄家。“总部”的对立派“联纵”，也利用批判何是之际，清除观点倾向“总部”的干部。何是被关在杨浦区公安分局，直到1970年才释放。以后还被关押过几次，所有关押时间加起来共两年。最后虽被放出，但定为反革命分子，回厂劳动，直至文革结束。^②

文革号称造反运动，号召“怀疑一切”精神。但实际上，所谓的造反，必需与决策层意向一致，只能定向造反。何是對抗文革话语，为刘少奇争辩，违反了导向，遭到严酷批判，充分显示文革的“四大自由”的实质。

《一切为了九大》以“阶级关系变动论”解读文革

1968年2月，中串会遭到批判。起因是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九大》。

《红卫战报》1967年9月被市中学红代会接管，倾力办了近一年的报纸就这样易主，“红卫兵上海司令部”（简称“红上司”）的一些人很不甘心。换出入证后

^①徐景贤：《十年一梦》，2003年。

^②本节所引何是文章，均出于上海工人造反报1968年3月编印《“东方论坛”反革命言论集》，其它内容为笔者2013年2月19日对何志强（何是）的访谈。

的一天晚上，原光明中学红上司在《红卫战报》的编辑杨志东，潜入编辑部，拿走了公章和“红卫战报”字样的报头制版；然后与光明中学的原《红卫战报》编辑冯军，以这个制版，于10月底办了份油印版的《红卫战报》，11月21日出了第一期，刊号为“复刊号（总43期）”，以示对原红上司所办的《红卫战报》的延续；主办单位也与原来一样，仍是“《红卫战报》编辑部主办”。^①他们还特地刊登了《复刊词》，以及告读者书《我们为什么要办〈红卫战报〉油印版》。告读者书声明：自从被中学红代会（筹）接管后，《红卫战报》“大权被窃，庸夫当道”，“毫无生气，笔迟锋钝”；所以决定办油印《红卫战报》，“给那些想在政治上、经济上扼杀《红卫战报》的家伙一记响亮耳光”。以后的几期油印版上，也刊登多篇针对市中学红代会的文章，例如复刊号总第3期上的《评〈关于中学运动串连会问题的联合声明〉》，总第46期上的《反对口头革命派》、《驳对〈前进〉的几个谬论》，等等。共办了四期，刊号到“总第46期”。

“上海中学运动串连会”（简称“中串会”）本来就对《红卫战报》被市中学红代接管很不以为然，认为是抽去了《红卫战报》的造反精髓。而且《红卫战报》本来是中串会的话语平台，被市中学红代会接管，中串会失去了说话的阵地。看到光明中学的油印版《红卫战报》，中串会联络会议认为：应该正式办一份报纸，以发表中串会的声音。于是派交大附中学生魏威，前往光明中学与杨志东等联系，组建编辑部。^②

“中串会”不承认市中学红代会接管后的《红卫战报》，称其为“伪《红卫战报》”；将自己这份报纸仍然称为《红卫战报》，而且仍然沿袭原来的刊号，将光明中学编的那四期油印的也算进。首期刊号定为“总第47期”，以示与市中学红代会接管之前的《红卫战报》之间的延续与传承。办报的纸张由一些大学的红卫兵组织支援，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红鸥去炮司要来。由于上海所有的报纸都由《文汇报》、《解放日报》和原《新民晚报》（后被《工人造反报》接收）三家报社承接印刷，这三家报社全部由市革会掌控，中串会的这份报纸没有地方印刷。而他们又不愿用滚筒油墨印小开的传单式报纸，坚持开面一定要与原来的《红卫战报》

^①笔者2011年4月19日对原《红卫战报》编辑、光明中学学生冯军访谈时，冯军只记得他们肯定办了油印版的《红卫战报》，但记不清到底办了几期。以后，笔者在上海史资料收集专家林鸥那里，看到了他所收集到的油印版《红卫战报》，共有总第43期（复刊号），总第46期，还有一期没有写明刊号，估计是总第44期或45期。以后“中串会”办的影印版是总第47期。如此推算，油印版应该办了4期。

^②参加办报的主要有交大附中高三学生魏威、复旦附中高一学生张水荣、复旦中学高一学生管宇春、光明中学初二学生冯军等。

一样大，对开。有人想出用手抄后晒图影印的方式，大家都觉得可以。于是由交大附中负责誊写，红鸥去印刷技校联系了印刷事宜。^①1968年1月20日，第一期（总第47期）影印版《红卫战报》出版。主办者为“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中串会的对外名称，大型歌舞剧《前进》的“主办单位”用的就是这个名字。这份影印版《红卫战报》可以说是中串会的机关报。

就在“中串会”筹办影印版《红卫战报》时，他们看到一篇署名“毛兵”的文章《论思潮斗争》。文章刊登在上海中学的一份油印刊物《中学红卫兵》上，是中串会观点的上海中学学生宋永毅等办的。文章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在第一次大成功之后，胜利的少数者，总是发生分裂，有一半，对于已经获得的，觉得满足；有一半，却还要向前进，提出新的要求。”而且毛兵分析说，这些“觉得满足”者，都是当前的“温和派”。这篇文章受到影印版《红卫战报》编辑们的注意，魏威于是向毛兵约稿。

毛兵是上海中学高三学生，原名戚伟堂。文革中曾取名毛卒，“毛主席的小兵”之意，但随即被质问取这个名字居心何在？因为“卒”还有“死亡”之解。于是他改为“毛兵”。他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喜欢研究理论。一个当时和他比较接近的学生文革后回忆，说他“中等身材，长得相当漂亮”，“聚会中常以雄辩口才和独到见解令人折服，特别是他对文章中每次用词的细微差别，以及他对马列著作的熟悉和引经据典的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在干部身上，因此这次运动的对象是干部”；“他立志成为一名最下层人民的代言人。他最为崇拜的对象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比尔和马拉。”^②

第一期影印版《红卫战报》上，刊登了毛兵写的《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以及魏威写的《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但没有引起反响。编辑部于是决定，第二期上要刊登有分量的重头文章。毛兵在编辑部谈了自己关于阶级关系变动的观点，大家觉得耳目一新。一致决定：“你写！写出来作为重点文章，作为‘中串会’的旗帜！”^③

但毛兵交出的初稿，内容冗长，语言生涩，而且不分段落，没有小标题，让

①以上资料为笔者2009年11月25日对当年的“中串会”成员（复旦中学高一学生管宇春、复旦附中高一学生张水荣、交大附中高三学生魏威）的访谈，以及笔者2011年4月19日对原《红卫战报》编辑、光明中学学生冯军的访谈。

②管宇春2014年未刊回忆录：《〈一切为了九大〉写作前后——我和毛兵》。

③笔者2009年11月25日对魏威、管宇春、张水荣的采访，这段话是张水荣回忆的。

大家读不懂，看了半天不知所以然。于是，由魏威做了大量删节，并分段加小标题。除此而外，毛兵的初稿有好几处很“出格”的观点，大家看了后，觉得太激进，要毛兵删去，毛兵开始不肯，后来做了妥协，同意删改。文章原来的题目是《为党的“九大”胜利召开而奋斗》。编辑张水荣觉得太长，改为《一切为了九大》。^① 1968年2月15日，第二期（总第48期）影印版《红卫战报》出版，《一切为了九大》被放在第一版。

文章认为，文革是一场变动阶级关系的大革命：

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者和最集中的代表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主要地位了。这一基本史实，对于阶级关系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不断铲除这些渣滓，引起了阶级关系的不断变动，引起了革命队伍中依靠对象，团结对象，争取对象以及清洗对象的不断变动，引起政权的相应变化，这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史的主要内容。

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由此可见，阶级阵线变化与否并不决定掌权阶级变化与否。

文章对十七年的政治身份划分标准提出异议：

被走资派所发现和组织的十七年来的“左派队伍”，并非完全是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已经暴露出其中有一些是右派，为数众多的是中间派。

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会比干部好。走资派排斥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分子。越是基层，越是受到黑线影响小的同志，比较接近生活，比较尊重客

^①同上。但是所谓的“激进观点”具体是什么，魏威说“我现在已经忘了，反正很厉害的”。笔者曾经问过他们，在撰写《一切为了九大》时，是否受到湖南、湖北等地同时期的异端思潮的影响，他们说没有，因为没有看到那些文章，包括毛兵。湖南“省无联”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他们是在出逃的路上才看到的。不过北京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可能毛兵看到过。

观，尊重真理，也就比较能接受毛泽东思想。^①

第一期的出版日期标明是1968年2月15日，但这只是纸面上的日期；真正的出版日期在2月22日之后。据说，这是因为这一期上还刊登了一篇文章：《长宁区文化革命运动考察报告》，内容针对张春桥2月22日在各区县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为了掩饰文章的指向，编辑部特地将出版日期标得比张春桥的讲话提前。

②

第一期影印版《红卫战报》出来后，立即受到注意。市革会群运组的朱维铮，密切注视并跟踪着中串会的活动。他收集了大量中串会的资料，不但包括《一切为了九大》文章，还包括之前毛兵写的《论思潮斗争》，以及中串会在华东局等处的活动情况，密报徐景贤。徐景贤说，这是一股“反动的社会思潮”，说“一切为了九大，是一切为了反九大”。在市革会的组织下，^③市中学红代会在《红卫战报》上，连续刊登几组文章，批判《一切为了九大》。市中学红代会自然不承认影印版《红卫战报》，也称其为“伪《红卫战报》”，说这张报纸就是反对市革会的，而且还“诽谤始终走在中学运动前列的‘市六’、‘控江’”，“旁敲侧击、含沙射影，矛头直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春桥、文元、徐景贤同志”。^④

外滩、北站等市区主要马路上，出现批判《一切为了九大》的大标语，一个墙面一个字，魏碑体：“彻底批判反革命大毒草《一切为了九大》”、“打倒毛兵”、“打倒魏威”。“毛兵”和“魏威”每个字上都被打上叉叉。2月8日，上海中学的中串会对立面“狂妄评论编辑部”，到毛兵的家里抄家，将《一切为了九大》的底稿悉数抄去。越来越紧的风声，令毛兵、魏威、管宇春和红鸥等人很紧张，觉得外出躲避为妥。1968年2月底左右，他们分两批逃离了上海。

①《一切为了九大》，载于照相影印版《红卫战报》1968年2月15日总第48期，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战报》编辑部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②这个分析是当时市革会写作组朱维铮1968年3月7日给市革会的一份报告中写的，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中串会〈红卫战报〉的一些问题》。报告还认为，为了将这个假的出版日期弄得像真的，第一期的第三版上还特地刊登了一个《会议通知》，时间是2月18日在光明中学。他特地去该校了解：没有开过这个会议。文革结束后，影印版《红卫战报》编辑魏威在看到朱维铮的这份报告后对笔者承认说，他们当时确实是倒填第一期的出版日期。

③笔者2009年11月25日对魏威、管宇春、张水荣的采访。

④《让伪〈红卫战报〉见鬼去吧！》，载于1968年3月14日《红卫战报》、《上海红卫兵》联合专刊。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对中串会的批判全面展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3月28日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特意写上“彻底批判以右的和极‘左’的面目出现的各种反动思潮”。并且一方面布置上海的“四报一刊”^①全面围剿“反动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又通过市中学红代会，对中串会主要成员办“学习班”。学习班设在淮海路、汾阳路口的上海教师进修学院，从1968年3月21日到4月10日，共二十多天，参加者不许回家。被参加学习班的有中串会联络员，有向明中学高三学生王毅捷、交大附中高二学生金小峰；有《关于中学运动的七点声明》的起草者、徐汇中学高三学生文贯中；有歌舞剧《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总指挥、交大附中高三学生彭正勇，编剧、复旦附中高一学生许锦根；编剧兼朗诵、徐汇中学高三学生顾维萍；还有影印版《红卫战报》的编辑或撰稿者张水荣、宋永毅等，共二三十人。出逃在外的魏威和红鸥，学习班结束前被“揪”了回来。魏威因为是影印版《红卫战报》的主要负责人，作为“伪《红卫战报》主编”被批判。毛兵外逃没有找到，但学习班结束后不久，也被抓获。

整个学习班一方面批判这些中学生，另一方面要他们交代中串会背景，揪“黑手”。尤其文贯中，其父文强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将、共产党与国民党交战时淮海战役中的战俘，此时还关押在监。文贯中于是被作为“对共产党刻骨仇恨的战犯儿子”、“反动学生”、“黑手”，在学习班上多次批判；学习班快结束时，又当场被宣布为“反动学生”。学习班上还批斗了两个成年人，一个是王维，文革中被“靠边”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毅捷的父亲；另一个是胡道静，著名学者，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过《中央日报》上海版的副总编，曾在一封私人信中称赞过《前进》。学习班结束那天，市革会负责人徐景贤等到会。徐景贤发言说：你们看，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上海版总编，一个是共产党的《解放日报》总编，正像毛主席说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政治斗争的继续。徐景贤指名要红鸥发言，因为红鸥一直不说话。徐景贤说：我今天还要听一个同志发言。这个同志在文革初期紧跟春桥和文元同志，在反对陈、曹为首的海市委的斗争和一月革命中都做出了贡献。现在她犯了错误，春桥同志最近还向我谈起她，希望她改正错误。今天我想听听她的发言。红鸥一下哭了，只得讲了几句话。徐景贤说：我一定把你今天的讲话向春桥、文

^①即《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上海红卫战报》、《支部生活》。

元汇报。^①

徐景贤说这些话的时候是轻松的。继红革会、炮司及红三司发起的1967年初1.28炮打，以及1967年5至8月的联司和支联站之后，中串会是上海造反派组织中的又一异类。他们老是和中学红代会对着干，让人觉得他们实际矛头是对着市革会甚至张、姚的，这是对以上海市革会为首的文革新秩序的再一次挑战。现在以这样的形式将他们打压下去，平息了又一次潜在的危机。而几天之后，1968年4月，上海残存的反对派势力，都将在4.12炮打中全军覆没。建立和巩固文革新秩序的障碍，将被从组织层面扫清，上海的舆论重又归于一律。

毛兵被投入监狱关了四年，而且很长一段时间被单独监禁，手铐在手腕勒出的深深伤痕，从此伴随终身。^②文贯中被作为反动学生送回徐汇中学，关在学校“牛棚”继续批判，“劳动改造”整整一年，其间遭到一次又一次毒打，衣服被血粘在身上无法脱下；有一次被打得无法行走，只能爬回家去。其他许多有关人员，虽然不久都从学校毕业，或上山下乡，或被分配工作，但到了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中串会又被列为十个“反革命大案”之一，一些人又一次被揪回关押或受到批判。

中串会除了王毅捷是干部子女，其他主要骨干大都是职员家庭的子女。他们是在反血统论中走到一起的，所以他们将批判矛头指向政治等级身份。毛兵自己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他对唯出身的“阶级路线”有着切身感受。毛兵的“阶级关系变动”论，不但将“走资派”作为文革的对象，而且认为“走资派”的依靠对象，那些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培养的积极分子队伍，也应该变更，提出“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会比干部好”。这是对历次政治运动结果的质疑，也是对政治名分等级的质疑。毛兵认为“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在干部身上，这与毛泽东文革的方向是一致的。虽然囿于理论资源的不足，毛兵只能以文革话语阐述自己的这个思想，但他的这个思想，已经超出文革的批判，是对权力异化的警惕与警告。

桑伟川挑战“丁学雷”对文艺评论的话语垄断

^①笔者2011年4月26日对侯美度（红鸥）的访谈；此外，魏威、许锦根等人对笔者的回忆中，也都提到徐景贤的这段话。

^②43年后，2010年2月5日，笔者见到他，他手腕上当年被手铐勒出的痕迹还十分清晰。

1969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丁学雷的一篇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

《上海的早晨》是周而复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周而复是共产党作家,1951年曾作为“五反”工作队员,在上海一个棉纺厂和一家商店全程参加“五反”运动。后担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本书就是他写的共产党执政初期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1958年在《收获》杂志发表,同年下半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丁学雷的文章正是批判这本书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又在一个月中连发五个整版,都是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文章。丁学雷的文章不但对着刘少奇,而且对着陈毅等当年主持上海工作的干部们。文章分析了工商业者被革命剥夺财产时的心态,以及执政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得出结论:《上海的早晨》是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工人阶级、鼓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丁学雷的文章遭到上海煤气公司管线所助理技术员桑伟川^①的质疑,他花了两星期时间,写了篇商榷文章:《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同志商榷》。文章认为:“作为小说《上海的早晨》是如实地反映当时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并描述怎么以无产阶级的路线政策改造资产阶级,解决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作者是站在保护工人阶级的立场歌颂了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这是作品的主流方面。由于小说在塑造英雄人物方面有错误,对资产阶级形象刻画上有所描写,对中间人物工人汤阿英也着重刻画,陷入了修正主义创作路线。即使如此,我认为不应该一棍子打死。”^②1969年9月初,桑伟川将自己的这篇文章寄给文汇报社,还具上自己的真名,要求发表:

编辑同志:

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一文的发表,又一次吹响了文化思想战线上进击的战斗号角。对于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者来说,必须立即拿起大批判的武器,继续革命。毛主席说:“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也说文艺批评与反批评是文化思想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毛主席又说:“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所以,

^①桑伟川,上海煤气公司管线所的助理技术员,因撰写与丁学雷商榷的文章,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判刑7年,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8月平反。

^②《文汇报》1969年11月20日。

我写《评〈上海的早晨〉》一文，参与战斗，以引起争论，为落实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与怎样才算得是一个好的党的领导者等方面，得出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统一认识来，并为繁荣无产阶级的文艺，占领上层建筑作出努力。希考虑刊载。

致继续革命的敬礼！

桑伟川^①

《文汇报》收到桑伟川的稿件后，以《一篇为〈上海的早晨〉翻案的毒草》为题，写了一份内参上报。徐景贤看到后即转张春桥，张春桥批示：桑文可以考虑发表，报社要写编者按语。先把文章打印出来，讨论一下，有准备地打好这一仗。几天后，张春桥看了文汇报社报送给他的批判桑伟川计划后，又指示：“把桑伟川的文章打印出来，多找一些人看一看，甚至可以考虑，找对立双方开座谈会，在上报以前演习演习看。”徐景贤也批示：“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找对立双方开座谈会，把有些论点‘放’出来。”^②

10月13日晚，《文汇报》举行“座谈会”，桑伟川赴会。他在会上坦然道出自己的看法，包括对其他文革前文艺作品的赞扬。这个“讨论会”马上又被写成内参报张春桥和徐景贤等。几天后，文汇报组织了几个版面的文章，大样送徐景贤。徐非常仔细地审阅了每篇文章，精心修改每个版面，还指定哪篇先发，哪篇后发。^③11月20日，《文汇报》整版刊登桑伟川的文章和附信。在桑伟川文章的上方，是通栏的字号大得出奇的“编者按”。这个按语是由张春桥和徐景贤亲自修改定稿的。按语将桑伟川的文章定为“毒草”，号召对它开展批判。接着，两个月内，《文汇报》以“彻底批臭反动小说《上海的早晨》”为通栏标题，发表了整整十一个版面的文章；《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也相继刊登有关批判文章。

之后，桑伟川便被“隔离”，失去人身自由，遭到一次又一次批斗。桑伟川辩护说：“观点不同是客观存在”，“我写的这篇文章，我认为观点是对的。各种意见可以争议嘛，要摆事实，讲道理。”但他还是遭到拳打脚踢。桑伟川在批斗会上大声疾呼：“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拿我当敌人看待，对吗？要好好区别两类矛盾。我是人民的一员，我的观点应允许保留。”在“隔离室”中，他提出：（1）

①同上。

②张春桥的批示转引自1978年9月12日《文汇报》载：“‘四人帮’制造‘桑伟川事件’的鬼域伎俩”

③同上。

批判会应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使人口服心服；（2）不要人身攻击，不要将对方推到对立的立场上去；（3）暂时不能口服心服，应允许我保留观点，不要乱上纲；（4）对我的批判，只要不动手，我还是愿意听的。1970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丁学雷的又一篇文章：《阶级斗争在继续——再评毒草小说〈上海的早晨〉，并驳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这篇文章是姚文元修改定稿的。桑伟川看后表示：“我要再写一篇批判丁学雷的文章。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有些东西，现在看是庞然大物，但终究是要完蛋的。我要再写文章批判丁学雷，这次直截了当地就是批判。”

桑伟川争取的是言论自由，是发表与主流政治不同看法的自由。但这样的要求显然是与虎谋皮。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这个仅仅因对一本小说的评价与主流政治有不同看法者，被游斗290余次，参加的人数70万，最多的一天游斗7次，其中规模最大的“批桑”拉线广播大会，60万人被组织参加。桑伟川被整得病倒在床，一些人将桑伟川抬到会场继续批斗。桑伟川就这样被逼疯。但1975年，他还是被以“反革命”的罪名，判刑七年，押送外地劳改农场。桑伟川工作的煤气公司以及管线所，因为同情和支持桑伟川的观点，四十多人受到株连。^①

对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几十年后，学术界有不同的评价。桑伟川和丁学雷辩论的意义，不在于对周而复这篇小说的评价，也不在于对这场运动的评价。这场辩论的核心，是民间思维对主流政治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丁学雷”当时是上海文学评论的权威，代表着主流话语，几乎是真理的解释者。桑伟川代表着民间思维。主流话语对任何不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观点，从来就是批判打压，不允许存在。桑伟川却敢于公开自己的不同意见，即使遭到高压批判，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将每次的批判会变成辩论会，看起来是对“丁学雷”文艺评论话语垄断的挑战，但实际上已经是对执政党话语垄断权的挑战。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少见的。桑伟川明知会遭镇压，却仍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的勇气，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让许多人佩服。

不平的《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质疑唯阶级论

^①同上，以及《上海文革史话》第911页。

1972年5月12日，人民广场出现一张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许绍吉，笔名“不平”。

文革刚开始时，许绍吉是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他出生工人家庭，但父亲有“政历问题”，入不了团；文革初期，也因此加入不了红卫兵，让他加入“红外围”，这是专为“出身不好”学生成立的组织。他没有资格参加革命，但反正学校不上课，于是利用这段闲暇时间读了许多书。有鲁迅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文章，还有1957年反右前夕报纸上刊登的那些“鸣放”文章。“鸣放”文章给他的震撼是巨大的，因为他实在看不出这些被定为“向党进攻”的文章有什么错，相反他觉得很有道理。他文革后回忆说：

这些文章给了我大大的启蒙和震撼。使我认识到57年的反右，根本就是一场冤案；使我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是30年代中国的翻版，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起来，我对西方的人道主义方面的著作倒是看得不多。共产党要批判我的话，当然可以给我加上种种罪名，但是若说我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则是绝对不确的。我其实是土生土长的。^①

1967年3月以后，中央要求学生回学校“复课闹革命”。许绍吉也参加了学校的“教学改革”，编写学校教改刊物《教学革命》，但是不久就觉得是瞎起劲。于是，他开始写文章。最先的一篇文章是向毛泽东学习的长文，写好后，许绍吉自己刻写蜡纸，但终于没有印发。后来又写了许多随想和札记，越写越一发不可收拾，十个月写下来，到1968年毕业分配前夕，写了54篇文章共近20万字。许绍吉将这些文章归结在一起，起了个名字《肥田集》。意思是文章供讨论，即使是“毒草”，也可以通过批判肥田；典出毛泽东1957年“反右”时关于“香花”、“毒草”的一段话。

许绍吉的文章分三个方面：一是质疑执政党凡事都以阶级观分析的思维方式；其中，《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直接针对《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这篇陈伯达签发的社论，

^①不平著《挑战毛泽东》，美国成家出版社2003年印刷。本节内容，包括许绍吉的回忆，全部引自此书。许绍吉在人民广场边张贴《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一事，笔者当年就曾经听说。

是根据毛泽东亲自指定的《5·16通知》写的。许绍吉的文章，一开始就直接引用这篇社论的段落：“你们果真是讲真理吗？不。你们是在打着‘真理’的幌子搞阴谋。你们采取挖心战术，从根本上抽掉了真理的阶级性。难道你们不知道，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真理，绝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真理吗？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真理和谬论，香花和毒草，不同的阶级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你们所吹捧的‘香花’，正是我们所要铲除的毒草。你们所坚持的‘真理’，正是我们所要反对的资产阶级谬论。真理是客观的。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只有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掌握真理。”许绍吉针对的就是这段话中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真理，绝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真理”，也即真理有阶级性的断言。他写道：

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们社会的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应该说，只存在着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阶级、集团和个人的客观真理，从来不存在着依赖于人的、随着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不同而不同的主观真理。这又是一条没有阶级性的真理。

在当时，《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是真理的解释者，许绍吉却反对它们对真理的垄断。他还在文章中调侃这种唯阶级论的思维方式：

假如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存在着无产阶级真理和资产阶级真理，那么谬论也该有阶级性了，还应该存在着无产阶级谬论和资产阶级谬论。

这样有针对性的批判文章还有《评〈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是针对1966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

二是反对个人崇拜，例如《论个人崇拜》、《反对奴隶主义》、《再论反对奴隶主义》、《谈毛泽东思想》、《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论“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论“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他的狗头”》，等等。其中，《论个人崇拜》，是针对毛泽东1972年3月对斯诺的一次谈话。毛泽东为自己辩护，说“总要有个人崇拜”。许绍吉反对毛的这些话，认为个人崇拜不是毛所说的要“降温”，而是必须停止：

我们不要个人崇拜，我们要的是崇拜言论，崇拜真理。崇拜个人就是崇拜某一个人，然而人总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神。即使是无产阶级权威，他也不是没有一点缺点，连错误的东西都崇拜起来，怎么行呢？

人与人之间用不着崇拜，既用不着崇拜别人，也用不着别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可以自由地进行争论、辩论、讨论，谁也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这就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上帝与人或神与人的关系。

三是讨论什么是革命，例如《论革命——不满与革命》、《再论革命——光明面与阴暗面》、《上纲上线》、《强权与真理》、《稳当的英雄》、《从阶级性谈起》、《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打倒极左思潮》，等等。四是反对执政党对言论、出版自由的禁锢，如《反对版权集中》、《自由竞争》、《马克思论出版自由》，等等。其中有一篇《也论“吃小亏占大便宜”》，是赞成“东方论坛”的何是的观点的，还有一篇《放？》，反驳《工人造反报》对何是的批判。当时何正遭受批判，许绍吉曾匿名给何是写信，给他支招如何反批判。

不过，所有的文章，除了本节开头提到的那篇，始终没有公开发布过。许绍吉一直想将自己的文章公布于世。他后来回忆说，“中国的大事有千万件，但是最根本的一件是：言论自由”。“对建国方略、经济决策之类大问题，我提不出很高深的见解，但是，我愿作一个马前卒，为一个可以自由讨论我国根本问题的环境而贡献自己。”“当时的感觉，就仿佛自己是《西游记》里的孙猴子被关进了一

个什么玩意儿，四周一片漆黑，手里拿着锥子，东敲敲，西碰碰，试图找一个薄弱点，找一个突破口。”

1968年底中学生毕业分配，许绍吉进了上海郊县崇明岛上的东风农场。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给许绍吉以极大的震撼。经过再三思考，他决心贴出自己的文章，公开冲决思想禁锢。这一阶段，他又新写了一些文章，加上原来的一些，精选了12篇，由浅而深，而最终以自由为诉求。他决定，先选择1967年写的那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以讨论哲学问题作为头炮，“可进可退，进可以要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退可以说这只是对一个哲学问题想不通。”1971年，上海郊县农场开始将大批知识青年上调回市区，大都安排进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但许绍吉没有报名要求上调，因为此时他已经决定破釜沉舟。不去市区工作，可以减少可能的政治压力。

1972年5月12日一早5点多钟，许绍吉来到人民广场，和平电影院对面的科普画廊，将抄成大字报的文章贴在画廊下面，并具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为了减少张贴大字报的时间，避免在未张贴完时就被抓捕，他事先将二十多页大字报纸前后相粘，所以很快就贴完，也很顺利，没人阻拦。在贴大字报之前，许绍吉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象当场被抓的情景，这样的事没有发生。但是，之后他因为没有赶上回农场的轮渡，在过夜的火车站被执勤人员认为是流窜的无业人员拘留。许绍吉承认自己贴大字报之事，于是被转移至黄浦公安分局，“留置”四天后，16日中午被交给他所工作的东风农场。回农场后，负责人向他要去大字报底稿，最初没有下文，既没有批斗，也没有惩罚性“劳动”，行动也没有受到干涉。后来，连队里召开了一次辩论会，之后又召开一次批判会。都不激烈，没有口号，还让他坐着。事后据说，是上海市委对此事有三条指示，许绍吉记得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思想教育为主。

许绍吉还是很想按原先的计划，将另外一些文章陆续再贴出去。《鲁迅论创作》，已经抄成大字报。这份大字报虽然内容是鲁迅语录的汇编，但却是以四十年前鲁迅的话语，抨击文革压抑思想的现实。不过终于没有贴出去；他后来回忆说，这是因为他觉得大字报这一方式不能奏效，而且此时母亲得了癌症，他不忍让母亲再为他担忧。

虽然没有遭到连番批斗，但许绍吉的人生轨迹还是受到影响。以后，农场又

有几次知青上调市区，他都没有份。直到1974年，几乎所有1968年被分配进上海郊县国营农场的知青都被上调，只有被作为农场干部培养的对象留下。许绍吉总算赶上这次“末班车”，调回上海，分配在一家国营工厂，户口也因此转回上海市区。

许绍吉所有的文章，公布于众的只有《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而实际上，他思考的重点更在言论自由。这是1949年以来公民久违的权利。就连“自由”一词也成为贬义词，除了“自由恋爱”一词，所有与“自由”组合的词语都成贬义。尤其1957年“反右”之后，再没有人敢于对言论封锁提出公开反对。取缔了言论自由，就是隔离了思想的交流。许绍吉的这些文章当时如果全都贴出，他所遭受的，将不仅只是几场批判会。

王申酉全面否定文革，批判毛泽东

王申酉是1963年进校的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出身工人家庭，本是执政党的依靠对象。但打了四次入团报告，都没有回音。对这些政治上的压抑感，以及对周围政治辅导员、学生干部、积极分子们的不满，王申酉都写入了自己的日记。写进日记的还有他对当时正在实行的“教学改革”的不满。王申酉在日记中认为，学校缩短专业教学时间，将大量时间安排在政治学习和下厂劳动，实在是浪费时间。

在那时，因雷锋日记的出版，“要求进步”的同学几乎人人写雷锋式日记；而且华师大甚至形成不成文规矩：要求进步的同学以口头或书面，向班级里的共青团员、团干部“汇报思想”、“暴露思想”；书面汇报后来又演变成上缴日记本，把日记本作为书面思想汇报的方式。文革前夕的1965年11月，王申酉和同学们在上海郊县崇明岛参加四清。11月5日那天，他正在写日记时，被叫去接电话，日记本就摊开在桌子上，坐在旁边的一个班干部偷看了他的日记，并上报系党总支和校党委。校党委查阅了王申酉的家庭、亲友以及和他接近的中学同学的档案材料，没有发现多大的“反动”的证据。指导员要他交出所有日记，他拒绝了。没等事态再深入，文革开始。王申酉参加了造反派，他贴过常溪萍的大字报，也参加过对张春桥的炮打。但对立派揭发他“反动日记”的“老底”，还抄了他的

家，日记全部被抄去。

1968年1月，上海开展清队运动。1月11日市革会开会传达中央关于清队的文件，1月29日王申酉被抓。这天正是春节除夕。他被关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关押了1年3个月后，被“教育释放”；但又因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写了《我的自白》和《大学六年思想小结》两张大字报，被定为“敌我矛盾”，“监督劳动”。1970年华师大拟对王申酉毕业分配工作，但接收单位看了王申酉的档案后，不愿接受。同年11月，王申酉被学校送往地处苏北大丰农场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1972年6月，他被从大丰调回，在学校物理系做清洁工作和在学校农场劳动，但不久又给他戴上“反革命”帽子，再次“监督劳动”。

置王申酉于死地的是驻学校的工宣队。工宣队几次干涉和阻扰王申酉的恋爱，还向他的女朋友吴某施加压力，不许她与王申酉谈恋爱。王申酉于是决定将自己的思想系统地写成文字，让女朋友了解自己。1976年9月10日，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一早，王申酉正在学校写信，学校保卫科的人突然闯进，抢走了他写的信。虽然信已经被王申酉撕碎，但还是被拼接起来，定为“反革命黑信”，王申酉当天下午就被关进长宁区公安分局。

1976年11月18日，审讯人员笑眯眯地要王申酉将那份被撕碎的信的内容重新写出。此时文革已经结束，王申酉也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他在重写那封信时，将原来的一万字，扩充到六万字，和盘倒出自己的全部思想。他以为文革结束了，他的苦难将终止。他甚至梦想自己出狱以后，能够从事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研究。

他的坦诚却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1977年2月，中共发了5号和6号文件，指示全国镇压反革命分子。3月18日又批转国务院30号文件，规定“对写反革命大字报、大标语的人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恶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文革结束后的新市委，决定在“五一”前，公审和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王申酉被选作对象之一，依据就是他在监狱中根据要求写出的那个六万字的“供词”。3月14日，普陀区法院党组、区公安局分党委联席会议决定：对王申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普陀区委书记董镇不同意，认为王申酉只是言论，而且写的信也没有造成社会影响，甚至连收信者都没有看到。他将死刑改成了死缓，批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区法院党组将“死刑”

和“死缓”的两个意见，一并上报市高级法院。3月25日，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开会讨论，一致意见：判处王申酉“死缓”。但是当时担任上海高级法院院长的宋季文，却一定要将“死缓”改为“立即执行”。宋季文后来承认，他当时害怕被视作“右倾”，将判决升级了。^①宋季文文革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文革中的1975年任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文革结束后，中央派来的工作组保留了他的职务，但他却生怕自己的表现不符合中央工作组和新政法书记的要求，于是用他人的生命为自己的乌纱帽买单。升级改判为死刑的，还有另外10名“死缓”。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在一天内，听取并同意了56个死刑判决案，平均每六分钟通过一个死刑案。

1977年4月27日下午，在普陀区体育场三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区法院宣读了“判决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王申酉这是第一次听到对自己的判决，在这之前，他被提出监狱时，还以为是换监房。这样草率的判决，甚至不给犯人应有的申诉权，“立即执行”。三十分钟后，王申酉的生命被结束在31岁。死后第二天，家人才收到对他的判决书。

王申酉的思想基本都集中在他的六万字“供词”中。主要有七个方面：

(1) 开场白。

(2)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我的世界观。”王申酉以马列主义话语，提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违背，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符合经济基础。

(3) 对苏联历史的看法。指出：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规律，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起着最充分最完全的作用。苏联虽然实行社会主义，但商品经济仍起着作用，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因为严格地说，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因此不应该回避或否认商品经济，而应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引导它为新的生产方式创造坚固的物质条件。王申酉这是针对文革中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反商品经济的现象。

(4) 关于中国1949年以前历史的看法。王申酉以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个历史人物为样本：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分析中国革命的过程必须符合历史规律，认为毛泽东的土地革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争取了农民的拥护、支持。“中国

^①金凤《十年生死祭》，收于《王申酉文集》；金凤、丁东编注，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实质上是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它成功了，这是毛主席不可抹杀的历史功勋”。

（5）关于中国 1949 年以后历史的看法。王申酉认为 1953 年开始的互助组和 1955 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引起了党内的争论；而 1957 年的反右斗争——

基本上摧毁了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力量，党外资产阶级从此基本上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党内和党外的关系也从此发生了变化。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党内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种子，甚至为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内大分裂，埋下了祸根。因此，1958 年是考察建国后我国历史的极关键的一年。^①

王申酉赞扬上疏反对“大跃进”错误的彭德怀大无畏的勇气，赞扬他“不仅头脑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批评毛泽东“不愿承担三年经济困难的丝毫责任”。而刘少奇勇敢承认了党的“大跃进”错误，却“结果犯了一项大罪”。

王申酉指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给林彪写的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这封信最好不过地集中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在他的理想世界中，社会应分割为一个一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共同体——公社。在这个公社中，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不应有严密的分工，都既要学工、又要学农、学军，还要从事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即批判资产阶级。这个公社的生产方式是集体性质的，交换主要发生在内部，因为现实中的农村人民公社正是如此。因而这样的公社显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当然它也与外界发生物质交换，但只是与国家交换，彼此之间是不发生交换的”。王申酉指出，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是个乌托邦：

这样的公社自然会尽一切力量防止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的侵蚀作用，而每个公社社员又由法律规定是无法脱离公社的，世世代代要生活在祖传土地上，从事各种劳动，并且永远保持固有的生产方式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这

^①王申酉 1977 年《供词》，收于《王申酉文集》。本节中所引王申酉的文字全部出自这份《供词》。

样的村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长一段时间，如西方的克兰制、马尔克公社，东方的印度和斯拉夫公社。不过，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这种公社只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只会造成农民永久性的野蛮、落后状态，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6）“我对毛主席的看法”。王申酉对毛泽东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判。他在供词中表示，他曾经好久不明白，“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地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当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为我们这一代青年戴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他具体分析了毛泽东的历程，认为原因在于，毛泽东出身在农村，熟悉农业农民；但毛泽东对现代工业很不了解，对经济更是所知不多：

总之，我还没有看到过他对于中国经济形态（无论是农村或城市工业）具体分析的文献，甚至解放后他在领导中国实行重大的经济变革时期，也没有发表过这类著作。作为领导这样大的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对国家的经济作历史和现实的详细考察，要领导好国家的建设是很难想象的。从他对社会改造所表述的理想蓝图及实施的方针来看，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历史必然性及其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条件的认识是很不足的。很可惜，他没有去过西方实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解放前也大概没有去过国内某个现代化工厂、大银行考察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这恐怕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有不少影响。

对毛泽东的批判，还体现在其他章节。王申酉认为毛泽东有着浓厚的农民意识，反对现代社会所必须的社会分工；对经济规律不甚了解，对工业生产管理更是外行。即使在毛泽东批示的工业生产《鞍钢宪法》，也只提到二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生产、交换和分配问题，而鞍钢宪法都没有提及，只提倡取消分工”。

（7）关于对当时现状的看法。王申酉为文革造成的经济生产混乱担忧。在监狱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他凭记忆列出了一系列数据，包括和国外同期

对比的数据，指出，“当着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次是苏联集团国家的农业人口战后以来急剧减少时，中国的农业人口不但绝对增加，而且相对也在增加，这是世界上甚至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也很少见的情况”。

“究其原因公社制的生产关系是严重束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的。另外，国家又用行政权力把农产品收购价格压在最低不变的水平上。”他呼吁：“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状况永远没有改善的可能。”他为国民经济的停滞和倒退忧心忡忡。他尤其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反对将岗位责任制和规章制度批判为“管、卡、压”。在分配制度上，他反对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甚至普通工比技术工的工资待遇高”，指出“这种所谓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措施，很难调动青年工人的积极性”。

他还分析了科技、文教、外交、外贸的现状，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艺术，都是人类永久的精神财富，不应该被认为是桎梏而随意抛弃。

和其他异端者不同，王申酉不是试图以另类思索解读文革，他是站在对制度批判的高度，全面反思文革，追溯形成文革的深层原因，并对中国的未来提出真知灼见。当大部分思考者的思索范围多集中在民主、自由、法制上时，王申酉已经将思考向经济和政治结构伸展。虽然，由于长期理论的封锁，他所能运用的话语和理论资源，基本还在马列主义范畴；但他思考的深度，已超出了时代的局限。

王申酉的这些观点，在文革结束几十年后再看，许多已经成为常识。但在1976年，在思想和文化被禁锢了整整十七年的年代提出，不能不说是深刻和超前的；尤其在不许对毛泽东有任何怀疑的年代，更是独立和大胆的。为此，他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小 结

和北京相比，上海这个商业化了的城市，自1949年后，就没有出现过出格的抗争和骚动。只有从1966年的11月9日开始，上海才引人注目地发生了一系列大事，全都走在全国前列。然仔细看来，却又都是些既走在时政之前，又符合决策层心意的行动。或者说，是迎合了决策层想说想做而又不便于明确表露

的心愿。上海人特有的乖巧，在文革政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上海的文化政治特点：既有商业文化的实际和功利，也有法制观念相对普及的影响。从文革开始直到文革结束，上海始终以这样的特点演绎着文革。

但是，上海的另类思索，却为上海张扬宣示了热血和勇气。桑伟川，明知会遭遇不测，仍勇敢地大声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向一统天下、手握生死予夺大权的势力挑战。尤其是王申酉，在那个禁锢思想的年代，敢于怀疑至高无上的神圣。这些被毛泽东的文革“大民主”激活民主意识的青年一代，沿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试图对作为执政党执政基础的阶级身份政策进行清算，更试图对中国政治和政体作进一步探索。当时在全国，这样的探索者很多。比较有影响的有：1967年年底的湖南“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杨曦光执笔的《中国向何处去？》，武汉“北决扬”（“北斗星协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扬子江评论》）鲁礼安、冯天艾等编辑的小报《扬子江评论》上刊登的《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还有山东“渤海战团”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军权！》，广西柳州铁路《红卫兵战报》上的《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等等。发表观点的时间与中串会平行，几乎都在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①

这是以文革话语作为武器，挑战整个共产党专政的一股全国性思潮。虽然思潮的外壳仍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但核心却是探讨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这些被禁忌已久的论题。这是文革的异化，发动群众的临时手段“大民主”，被作为终极永久的目标追求。这样的追求自然不会被允许。^②

①毛兵写《一切为了九大》时，是否受到这些文章的影响？据以上所引的那篇管宇春的回忆：“很多人都问我：你们在写《一切》以前是否看到过杨曦光的文章？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没有。我看到《中国向何处去》是我和毛兵在逃亡途中。但是毛兵与清华团派的一些智库人物关系相当好，这中间有否交流我不清楚”。

②据笔者对魏威、管宇春、张水荣的采访，管宇春回忆，他们那时对《一切为了九大》被说成是“大毒草”很不理解。“为什么是大毒草？我们完全是在解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管宇春以后曾问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你们现在文章中的理论就是在用我们的理论，我们有什么错”？朱永嘉回答说：“你们走向了反面”。

【口述】

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一）

——原河南二七公社“火指”负责人袁庚华专访

袁庚华口述 李素立采写并整理^①

访谈时间：2013年12月24日下午预访，

2014年3月21日、4月23日下午和晚上。正式访谈。

访谈地点：袁庚华家

受访人：袁庚华

主访人、整理者：李素立

访谈方式：录音、笔记

主访人的话：

袁庚华，湖南湘乡人，1946年生，初中未毕业，到郑州肉联厂作学徒工。文革中成为河南全省的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的重要骨干，也因文革政治问题四次入狱，累计被囚十数年。1989年出狱后经商，并经常到全国各高校去讲学。在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页63—65）一书中，袁先生被称为近来“引起公众注意”的一位“老左派”。海内外多家媒体称其为“毛派思想家”。

一年前，笔者在“郑州思想沙龙”认识了袁庚华先生，有了采访他的机会。对过去的经历，袁先生思路清晰，侃侃而谈。虽然对他的一些观点笔者并不赞同，但他在文革中的“造反”及武斗经历还是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更令笔者大感意外的是，文革中家喻户晓、文革后“臭名昭著”的口号“文攻武卫”，袁先生说是他先提出来，并经江青首肯的。

那么它是怎么提出来的？又与郑州武斗的发生、发展和结束有什么关系呢？他的叙述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① 本稿经袁庚华审订、补充、修改——李素立。

一、从“二月黑风”到“5·4 惨案”，腥风血雨的郑州

李：您能不能谈一下文革当年郑州武斗的完整过程？

袁：概括地谈几个典型事例吧，主要是我个人亲历的。河南的文革造反是从郑州大学开始的，代表人物是其学生党言川。“河南二七公社”是河南、郑州七十二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后成立的。河南保守派当时宣传的“民谣”是：“‘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党言川当队长，一二三打砸抢”。“牛鬼蛇神”是指造反派批了“血统论”后，吸收了许多“出身不好”、“犯过错误”的人参加自己的组织。“打砸抢”是他们反咬一口，但是，我们也确实有过打砸抢，是他们逼的。

我参加的“二七公社”筹备会议，曾争论过“公社”的名称，因为毛主席否定了上海造反派夺权后的政权机构用“人民公社”的名称，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但是，我们只是群众组织，参加筹备会议的大多数代表赞成用“二七公社”的名称，以继承四十多年前“二七”大罢工的革命传统。

1967年2月7日，河南“二七公社”成立大会在市体育场召开。由于“二七”派控制的《河南日报》社正在被“河造总”（原来是造反派，这时已“投降”省军区）围攻得吃紧，我不得不暂时中断大会发言程序，调动一部分队伍随我去加强报社的守卫力量。这时，争夺中的双方靠的是“人海战术”，也有肢体冲突。那些日子，包括除夕之夜，我和战友们都是在风雪弥漫的报社外度过的。

17日中午，我又组织一支“二七”派中学生队伍潜伏进八中——其大门当时在纬三路上，正对着报社后门——准备黄昏时冲过“河造总”的封锁，增援报社内的守卫力量。将近黄昏时，省军区广播车来宣读周恩来要军队接管报社的指示。我亲自看了电报，签了字，通知“二七”派撤出报社，《河南日报》自此也落入“河造总”之手。第二天才知道军队却乘机抓了我们的人。为此，在“公社”内部我还受到别人的指责。

19至20日，军警介入河南省纺织机械厂和郑州印染厂两厂之间一场并不大的冲突，又一次只抓了我们造反派，仅“二七”派印染厂“八一”就被抓了237人。那天下着小雨，一辆辆军车，荷枪实弹，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当时，我站在金水路上亲眼目睹这一切，在路的上空，悬挂着“二七”派的七中“8.16”和

省一技校“造反大队”的草席横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未干的油墨汁随雨滴下……这一切，今天仍历历在目！

接着是国棉二、四、五厂，电缆厂等，开始了全市、全省的大逮捕。

3月6日，河南省军区召开有15万军民参加的大会，宣布“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布告一早上就贴出来了，我们在粮食学院嵩山路和伊河路岔口西南角那个楼，召开“二七公社”扩大会议。主持公社工作的杨锡淼（为“13所”即海军研究所的技术员，党员）提出要主动开除“郑大联委”以保留“二七公社”。我和郑州铁路局的郑建国（工人）等人则坚决反对。我们认为“二七公社”是以“郑大联委”为首，开除“郑大联委”，就不存在“二七公社”了。双方正激烈争论时，武装游行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我们，学生带领我们突围出去了。

二三月间，全省各看守所、拘留所关满了我们造反派。来自全国各省的消息也全是造反派被抓、被宣布非法，甚至被屠杀（指青海西宁“2.23事件”）。我压力很大，精神几近崩溃。3月18号我也被抓到省看守所，由于“客满”，又被转移到拘留所。用省委候补书记纪登奎后来对中央汇报中的话说：这时的形势是“把‘四大民主’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

在中央击退了“二月逆流”（我们当时称之为“二月黑风”）后，毛主席批示了军委十条和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五条，取消了军队随意抓人、随意宣布某个群众组织为非法组织的权力。《人民日报》4月2日还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指出：“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3月，“首都红代会”重又杀回河南支持“二七公社”，“二七公社”战士也纷纷走上街头！

军区被迫在各地大批放人，但还留了一些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如党言川等人。“二七公社”的群众就在市公安局对面的二七纪念堂门外静坐，4月30日开始绝食（李注：《河南省大事记（1949.3—1990.12）》，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页200说是5月3日）。5月1日，“二七公社”在省体育场召开大会后，数万人游行声援绝食。5月4日，全国有40多个解放军单位对河南局势发表联合声明，声援“二七公社”。

同日，省军区组织十万人游行，新老保守派的工人、农民，拿着省军区运来的棍棒、锄头、铁锹、砖头到二七纪念堂清场，大打出手，造成了有名的“5.4

惨案”。

1984年，一本当年保守派组织重要头头杨全志的会议记录被发现，其中记录了包括“5.4”和下面还要谈的其他武斗事件，省军区是如何策划指挥他们的。这8册会议记录被戏称为“出土文物”，并送达胡耀邦手中，其原件已在中央纪委存档。

二、“5·26 惨案”：“我们中了埋伏”

此时，我本人不在河南。

我是4月2日出监后去北京上访并串联的。那时的中央接待站很热情，安排的吃住条件都很好，住是不要钱的，吃饭没有钱可以先借支（别人用我的介绍信借支的钱，直到1973年中央信访部门还来函向我催要）。人很多，仅我住的白石桥中央党校的主楼就有好几千人之多，来自全国各地，持有各种观点的人，工、农、商、学、干，各种成份都有。他们带来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问题。

河南开始绝食后，江青办公室就打电话给“二七公社”驻京联络站，劝我们做工作，不要绝食，要爱惜身体。我们也觉得在河南的同志太激进啦！“5.4”后，经联络站动员，在京的“二七公社”人员大都立即回河南。一进郑州，看不到一个人戴“二七”袖章，街上到处是手持棍棒杀气腾腾的保守派武斗队，十分恐怖。其中一个联络员，也是我肉联厂过去的一个朋友叫夏震的在二七广场见到我说：“我只要喊一声，你是‘二七公社’的，马上你就没命了！”我说：“你喊啊！”他说：“不管咋说，看在朋友份上，你赶快躲起来，你们‘二七公社’完蛋了！”据统计，5月5日以来，被打砸血洗的“二七”派组织有23个。

我们回来前，“二七公社”一个管组织工作的叫薛建生（农学院学生），为避免更大的损失，搞了一个疏散通知，让大家赶快离郑，投亲靠友。我们从北京回来后，联系了大约有几千人，5月8日第一次走上街头，喊的口号是：“只要打不死，还要干革命！”我们很快恢复了组织。在有些学校、单位还占了优势，逐渐建立了一些宣传阵地。也不断遭到对方的武斗袭击。他们就是不让我们说话（宣传）！

1967年5月26日中午，郑州一中“红旗”等中学“二七”派把我们的死对头、河南军区政委何运洪的家抄了。也是在这前后，“二七”派的七中“8.16”

等擒获了省公安厅厅长王一鸣。省“公安公社”是河南保守派“十大总部”的核心组织，也是军区镇压“二七”派的主要打手。但王一鸣一直到中央把他带走审查之前，我们没有任何人打骂他。

下午，“二七公社”在河南省体育场召开批判何运洪的2万多人大会。期间，杨锡淼来电话说，我们在国棉六厂的“解放楼”被包围了，很吃紧！要求我们组织游行队伍去声援一下。我们从市区东部的省体育场，步行去西部棉纺路最西头的国棉六厂声援。在这次游行队伍中，打头阵的叫“二七近卫军”，是市区西南的中专技校“二七”派组成的准武斗集团，但没有武器，也只是鼓号什么的，显得齐整。

傍晚，游行队伍全部进入棉纺路后，各个工厂汽笛突然响起来了，铺天盖地的铁块砖头打向我们。接着，一辆大卡车冲进来，当场撞死5人，伤80多人。保守派的各个武斗集团从厂里冲出来大打出手。我和任延庆（在河南文革中影响仅次于党言川的郑大学生）原来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指挥，发现中埋伏后，就掉转过来，赶快往回撤。这时，杨锡淼带着烟草研究所十几个人骑车赶来，让我带着这十几个人赶快去省军区，要求他们来制止武斗。我们在省军区门口被保守派堵住围攻，一直到快天明了，我才翻墙突围出来。

27日早上，从河南医学院到郑大，我看到各个房间连走廊上都是伤员。这就是有名的“5.26事件”，伤了至少几千人。到28日，在医学院的重伤员中，又牺牲10多人。

李：哦，伤了几千人，死了有多少啊？

袁：死了恐怕至少有十五六个人。

第二天早上，（有人）看见独立二师（也就是现在的武警河南总队）师长，带着他的卫兵，从国棉三厂出来，卫兵臂上都戴着一块白毛巾，被群众截住。大家当时都认为，这位师长就是“5.26事件”的总指挥。

5月27日，我和郑大的学生李长杰商量后，赶快通知各个单位，在二七广场人民银行前集合几万人，开始游行示威。在我们“二七”派的队伍中第一次出现了棍棒等武斗器械。从二七广场到省军区，在省军区门口砸了它的大字报栏。然后，在七中大操场上我领着大家宣誓，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同一天，为抗议“5.26事件”，郑州铁路局机务北段的“二七”派“八一革联”

宣布罢工了！他们听说北京著名的学生领袖韩爱晶来郑州了，就邀请他去。我陪同韩爱晶一起去机北，分别代表“二七公社”和“首都红代会”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韩是参加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成立大会后路过郑州的。一路上，韩对我谈了他在西安的许多见闻，其中西安有一个中学的造反派老是挨打，他们提出一个“文攻武卫”的口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我们那些常在公社工作的同志（当时组织很松散，跟现在的志愿者差不多），在开日常会议时，我说，昨天韩爱晶讲那个口号，现在很适合我们，我们是不是把它也作为自己的口号，我们也得武装保卫自己，不然，我们一个个阵地都被他们夺去了，连命都保不住了，更不要说胜利了。杨锡淼认为，这是极左口号。这个口号和争论传出去后，“公社”各个部门都在讨论，也有人提出“文攻武守”。

三、“5·30 惨案”后，“我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

5月30日，在省军区领导和省、市公安局的保守派头头的组织和直接指挥下，全城拉警报大戒严（这是郑州解放后第一次），“十大总部”、“河造总”集中全部力量，分工攻击我们六个主要据点，就是宣传广播站。其中12万[李注：《河南省志·大事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443）、《河南省大事记》（页200）等书说5万]人围攻国棉六厂大楼。从下午开始，他们放火烧，使用大型吊车、推土机撞，六部消防车喷射含有烧碱、六六六粉和硫酸的高压水柱，什么手段都用尽了，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攻陷了！还有大石桥露天剧场等据点也被他们攻下！保守派甚至当场活活打死几个被他们审讯的“二七”派骨干，把几百名“二七”派伤员俘虏押往农村劳改。而且，有关他们还要将武斗进一步升级的情报不断传来。

5月31日中午，在郑州大学文科楼西头阶梯大教室召开“二七公社”（扩大的）紧急会议。

杨锡淼做了报告，他强烈谴责省军区和保守派对我们血腥镇压，另一方面也轻描淡写地检查工作不力。大家对杨锡淼的工作不满。我和几个人发言，严词批评公社五月份的工作：首先是逃跑主义搞疏散通知，然后是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我在发言中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接下来的发言，都否定五月份“二

七公社”的领导工作，赞成这个口号。郑州印染厂一个姓詹的造反派头头，点名要我组建一个新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得到会议的鼓掌通过。这就是当时“大民主”的民主程序。

由我组建的这个新班子，名为“火线指挥部”（简称“火指”）。这是“二七公社”第二届领导班子。第一届班子比较松散，大多不脱离本单位组织。这个“火指”基本上是全职的，也是“三结合”的。一是“二七公社”骨干单位和个人，另外两方面是首都和外地造反派来支持我们的代表和全国军事院校赴豫调查团的代表。“火指”建立时的成员有（按我当时签发的通行证排序）：任延庆、杨锡淼、省体训班教练单长春、袁庾华、粮食学院学生邱玉洲、农学院学生任其芳、医学院学生李胜先、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人郑家声、机校女学生高和平、郑大附中学生李××。外地和军校的代表不固定，其中比较活跃的是清华大学学生鲁梦铭、空军 002 部队的学员王翔等人。

李：您是第四把手？

袁：是我组阁的，以任延庆为首，杨锡淼相当于“博古”，也是为了公社领导班子的连续性。单长春曾任解放军“八一”自行车队教练，已 40 岁，任延庆 22 岁，我 21 岁，后来才知道单比我们还单纯。倒是 27 岁的郑大学生孟庆远被称为党言川的军师，在“公社”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也是“火指”的实际核心人物。还有不常在郑州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滑正本对我们的思想影响也比较大。郑大学生高树勋的“火指”动态部（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情报部门统称为动态部）接纳了一批表态支持“二七”的省、市领导干部，但他们对“火指”没有起什么指导作用。（未完待续）

【评 论】

年龄最大的右派？

——从叶恭绰到冒广生

津 平

几年前读《往事微痕》，看到第 5 期赵文滔的文章《他还是个孩子》，很感惊异。一个十六岁的中专生佟信顺，只是因为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不可能寄出去的信，询问美国的民主情况（当然这也是在干傻事），竟被戴上“极右分子”帽子送农场劳动教养，两年后，在 1960 年大饥荒中被活活饿死。

读完此文，痛惜之余我曾想，佟信顺可能是年龄最小的右派了。那么年龄最大的右派会是谁呢？我查了手头有限的资料，在名右派里面，出生在 19 世纪的有：章伯钧（出生于 1895 年 11 月），罗隆基（1898 年 8 月），曾昭抡（1899 年 5 月），潘光旦（1899 年 8 月），钱端升（1900 年 2 月），等。于是，我猜想或许章伯钧就是年龄最大的右派了。

最近读张中行的《负暄琐话》（黑龙江出版社 1986 年 9 月第一版，1995 年 7 月第 6 次印刷），有《叶恭绰》一文（在第 75 至 79 页）。说叶也曾在 1958 年被加右冠，1960 年摘帽。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为据张中行文，叶出生于 1880 年，“比鲁迅大一岁”。而据百度百科，叶出生于 1881 年。不管怎样，他都比章伯钧大得多，加右冠时已经是近 80 岁的人了。我想不通，给他戴右派帽子有什么意义？因为其时他几乎已经退出所有的社会活动了，而且他与毛泽东关系很好。我想请教各位网友，有谁还知道比他年龄大的右派吗？

对于叶恭绰，年轻人可能不大熟悉。我想做个简单的介绍（参考了《同舟共进》2009 年第 1 期散木的文章《罗翼群与叶恭绰》）。

叶老，字裕甫，又字誉虎，号暇庵，广东番禺人。广东叶氏是一大望族，叶恭绰祖父叶衍兰以金石、书画和文艺名世，其父叶仲鸾也以诗文、书法著称。叶恭绰家学渊源，少即聪颖，据说 7 岁能诗文，18 岁时应童子试，以《铁路赋》获第一名，为清廪贡生。他专擅倚声，是晚清词坛耆宿文廷式的弟子，夏敬观《忍古楼词话》称其“年十六七即能词，萍乡文芸阁学士廷式极叹赏之”。

叶恭绰出身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清末历任湖北农业学堂、方言学堂、西路高等小学堂、两湖师范学堂教习，邮传部路政司主事（主持京汉铁路事宜）、员外郎、郎中、芦汉铁路督办等；民国后历任路政司司长、交通部部长等职，并兼掌交通银行、交通大学；1949年后，叶恭绰任中国画院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他还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叶恭绰于学术、考古、诗词、书画无不精通，更以收藏著称于世，如西周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碑》等，都曾是他的收藏。他还编著有《全清词钞》、《五代十国文》、《广篋中词》、《广东丛书》、《遐庵词》《遐庵汇稿》等，曾发起的组织有中国营造学社、国学馆、《词学季刊》社、上海博物馆、中国文化协进会、中国佛教协会……

与北京大学的渊源：叶于1927年曾组建国学研究馆，隶属于“京师大学校”叶任馆长（见1933年编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

与毛泽东的关系，我只抄录几封彼此的通信。

毛泽东于1952年5月25日致叶恭绰信曰：

誉虎先生：

数月前接读惠书，并附萨镇冰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读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笔者注：即叶与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四人）来信，说明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市长接洽为荷。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同年8月5日，叶恭绰将其编辑出版的《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寄给毛泽东，其信云：

主席钧鉴：

恭绰年来渥承光被，稍获新知，然结习未忘曩时所业，有可供参考者仍随宜掇拾，冀附轻尘之助，兹印成《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一种方始出版。谨上呈一部，期承乙览之荣，并赐训诲。

附致

崇礼

叶恭绰敬上

八月五日

信中所谓“曩时所业”，正是叶恭绰喜爱和擅长的诗艺。毛泽东收到叶恭绰的信和赠书后，十分高兴，回函云：

誉虎先生：

承赠清代学者画像一册，业已收到，甚为感谢！不知尚有第一集否？如有，愿借一观。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

叶即回函，曰：

主席钧鉴：

奉示敬悉。《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舍间存书已悉毁于变乱。兹另觅得一部奉请存阅，不必交还矣。

馀致

崇礼

叶恭绰谨上

廿一日

毛泽东收到信和书后，十分高兴，据说后来他经常翻阅，并在中南海的书房里反复咏读。如今中南海毛泽东的藏书中，仍可看到这套书，首页还钤盖有毛泽东的藏书印——“毛氏藏书”。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70岁生日时，举办了规模很小的家宴，毛泽东仅请两桌客人，除自己的亲属之外，邀请了三位湖南老乡和亲戚——程潜、章士钊、王季范，另有一位就是叶恭绰。其时叶已经摘帽，不知在饭桌上是否和毛谈过“加右冠”之事？

叶老因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并曾捐建南京中山陵旁仰止亭，生前曾有遗愿，愿死后葬在仰止亭旁，并得到中共官方的批准。但由于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未能如愿。1980年2月29日，报上登了给他平反的消息，称其“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1980年3月中国政协为他举行追悼会，遵其遗嘱，将其骨灰葬于南京中山陵东侧仰止亭旁。

至于为什么给他戴右派帽子，我读到的文章均语焉不详。张中行说，因他“不甘寂寞”，“整风时期，听说因为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的关系，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散木的文章以及百度百科叶恭绰条都只说是“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停止了全国政协常委和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职务”。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知哪位网友清楚？如有人知道，盼不吝赐教。

附件有三篇文章，即张中行的，散木的，以及百度百科叶恭绰条。

右派冒广生

几个月以前，我写了题为《叶恭绰——年龄最大的右派？》一文，并且问网友，谁还知道比他年龄更大的右派？

怨我孤陋寡闻，近日读山东大学附中李昌玉先生的文章《冒广生——八六老人打右派》一文，才知道，冒广生被打成右派时已经86岁。

据百度百科，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曾列名

“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学者。他是一八九四年甲午科举人。光、宣两朝历任刑部、农工商部郎中，东陵工程处监修官。民国期间历任北京政府财政部顾问，浙江瓯海（温州）、江苏镇江、淮安等海关监督，农商部经济调查会会长，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广州勸勤大学、上海太炎文学院等文科教授及国史馆纂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上海文史馆馆员；毛泽东、陈毅对其尊敬有加，曾虚心听取他的意见，称其“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在八十六高龄被划为右派呢？对此至今仍是个谜。根据李昌玉先生的文章，冒广生不仅没有右派言论，而且还是支持共产党整风、反右的。1957年春，应陈毅之请，他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发表在6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和几乎众口一词地批评共产党的言论相反，他拥护整风，歌颂共产党。其时，冒老正在北京。该文被毛泽东读到，一时心血来潮，派遣总理周恩来登门邀请，随后派专车迎迓，在中南海会见冒广生。临别前，毛主席还问冒老：“冒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冒老坦言说：“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虬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主席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冒老起身辞别，主席亲自送冒老上了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沿，怕冒老碰了头，一片尊敬之情令冒老终生难忘。

6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记者对他的长篇采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冒广生老先生进一步明确表达了对右派反党言论的痛斥，成了最先出现的极为少有的“歌德派”。

冒广生回到上海，身体渐不如前，陈毅曾多次邀其去京参加政协，皆因病未能成行。

1959年8月10日，冒广生先生在上海病逝，遗体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李昌玉先生的文章称，如果历史真是这样，也就算很圆满了。可惜的是，多数写冒广生的作者为尊者讳，都留下了一点小小的遗漏没有交代，即冒广生及其子冒舒湮在1958年都被打成右派。舒湮写道：“不久，‘反右’扩大化，数十万人被卷入旋涡。”他父亲和他本人，都自毁“拔舌地狱”。他没有叙述任何原因。

我以为，在把社会名流定为右派时必须要有言论，而且要符合能被鉴别为“毒草”的六条标准之一。冒老只发表了一篇文章，即《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此文经毛泽东肯定，又因此受到毛泽东接见。那么究竟为什么给冒老定右派，也只能存疑了。

本文有四个附件，即冒老文章《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人民日报记者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李昌玉文章《冒广生——八六老人打右派》，以及百度词条《冒广生》。

2012年5月21日

【学苑新语】

革命万岁，革命死了

——评《八九点钟的太阳》

阿 秋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脑袋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欲在疯狂的季节
转了向，隔着栅栏
会见那些面无表情的山羊
直到从盐碱地似的
白纸上看见理想

——北岛：《历程》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卡玛以气势磅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作为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序幕，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冲击，将观众拉回狂热与虚幻的“革命年代”。大凡新政权建立，都要书写一套创世纪类的神话，重塑历史，巩固政权。《东方红》是毛泽东时代革命文化的巅峰之作，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青年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正如纪录片导演卡玛所言，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对于当时年轻人来说相当于宗教仪式。青年人在追寻人生意义的过程中，依靠其来摆脱繁琐的世俗日常生活，希望升华到超凡入圣境界。《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东方红》作为序幕，带领观众重新寻回那段青年人与革命理想间爱恨纠缠的心路历程。

两个小时的纪录片所能承载的历史毕竟有限，而文革则纷繁复杂，对权力斗争、道德理想、人性善恶的争论也模糊了历史的面孔。卡玛并不指望去表现文革

的全部，甚至曾在采访中称：“不愿意将其称作表现文革的。”她选择以中学红卫兵作为表现对象，但并没有浓墨重彩地渲染红卫兵在集体记忆中为人们所熟识的固有形象——残暴凶狠、狂躁无知，而是在影片结构上，以李南央、刘婷婷、遇罗克三个家庭的革命故事为主线，展现一代人关于革命理想的青春冲动，用客观叙说的方式启发人们对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性的重新思考。

由对“革命万岁”的高呼，到对“革命已死”的低叹，生于九十年代、崇拜物质利益的我们，很难理解那一代人对道德美感、革命理想由无限推崇到幻想破灭的心路历程，更难了解他们在“造反、镇反、平反”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与迷茫。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们不曾经历过“剃光脑袋、追寻太阳”的疯狂，亦不需与过去为革命理想痴狂的自己进行痛苦的割裂与诀别。作为历史的后来者，我们可以用荒诞去嘲讽文革时代青年人的愚昧与无知，但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去审视过去所谓至纯至善的革命理想，反思革命教育对思想的无情改造、道德美感对人性的偏狭遮蔽。约翰·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有一句话：心灵拥有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文革早已结束，革命理想亦已停歇，但不论对于文革中青年红卫兵一代，还是受迫害的所谓“右派”“走资派”，那都是一场肉体与心灵的炼狱。借着这部纪录片，我们需要反思充斥着唯美主义与激进主义的革命理想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打着正义旗帜的仇恨又会将人类引向何处？如何才能避免人再一次以自身的力量将同胞引入地狱？

一、革命万岁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东

纪录片中，李南央、朱学勤、徐友渔等许多人在反思自己文革中的革命理想和激情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文革前十七年革命化教育对自己的影响。历史学者叶维丽也曾经回忆道：“六十年代中期革命化过程中对我们一代人‘再教育’非常成功。到文革前夕，‘人道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为革命青少年

所不齿。”^①当时的教育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方针，学生参与大量政治学习，包括下乡劳动、参加军训、学习赞颂革命的文艺作品……^②青年人被喻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被寄托了革命的理想与期望。青年人建立起对革命的强烈认同，在自我崇高感的笼罩下，人人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企图拯救世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激荡的革命理想伴随的是虚幻的道德美感，青年人迷恋于终极的道德理想，痴狂于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梦想，在似梦非梦的幻象之中，那是一个没有私欲、精神上纯而又纯的道德乌托邦。革命理想诱惑着青年人诉诸情感而非理性，对政治奇迹投去孤注一掷的希望。加之青年人所拥有的特质——“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③于是，他们满怀对革命的奉献与牺牲精神，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以革命为名义的运动中去，打着革命理想的旗帜犯下骇人的罪行。

毛泽东时代，极权主义体制下的革命化教育建立起革命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思维。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有过分析：“意识形态思维将事实都组织进一种绝对逻辑过程，这种逻辑过程从公理上接受的前提开始，从中推论一切事物。”^④极左思潮下，以道德乌托邦为目标的革命理想的话语体系中，历史由阶级斗争所推动以及道德上的利他主义成为逻辑前提，人私利动机的合理性不被承认。顺着逻辑推演而来，青年人当以雷锋为榜样，作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要以天下为己任，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而为己谋私利者即为破坏革命理想的阶级敌人，对待阶级敌人就应当残酷无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在追寻革命理想的过程中，每个革命信徒都应当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有革命同志和战友，自我的意识与利益服从于政治集体的意识与利益……青年人迷恋于革命观念的同时，也为其背后的一整套逻辑所捆绑。这种逻辑过程“好像一种强有力的触角从四面八方抓住你，你好像被老虎钳夹紧了，你无力逃脱；你要么投降，要么下决心彻底输尽。”^⑤

革命化教育将革命塑造成为“盛大的节日”的形象，为青年们勾勒自由，民主，平等，没有私有财产的崭新图景。而在美丽新世界的背后，则是思想改造的

① 叶维丽：《从“公主”头上的纸冠到红卫兵手中的皮鞭——中学的阶级路线与“革命化运动”》，《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转引自《记忆》，2014年3月，第110期。

② 马昌海：《文革前的中学生思想教育》，《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③ 胡适：《容忍与自由》，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

④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72页。

⑤ 斯大林于1924年1月28日的讲话；引自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88页。

实质——“去人性化”。人有创造力，可以制造出无人预见的新事物，然而革命理想的核心却在于确定性，指出未来一切事物的道路。革命化教育要人们绝对地舍弃独立的自我，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零件。由此，也便上演了一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荒诞剧。1963年10月，《人民教育》杂志发起了对“母爱教育”的批判，强调要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指出阶级的爱、革命的爱和对领袖的爱绝对要高于亲情和师生、同学之间的爱，并且把人性爱的教育扭曲成了仇恨教育。^①在这种教育背景下，李南央因为父亲被打为右派，便耻于喊父亲一声“爸爸”，甚至“希望爸爸不存在，作为革命烈士早就死了好”。从直觉出发，没有人会喜爱丑陋与仇恨，然而丑陋与仇恨却常装扮成正义与爱的模样，让人难以辨识。人性的丑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革命万岁的山呼海啸中，人们看到的却只是虚幻的美丽；可怕的是，超脱于历史情境的人们所看到的那个时代，满是人类的恶，而历史情境中的人们却沉醉于革命与道德的美感之中。

纪录片中，在谈到北师大女附中学生打死副校长卞仲耘一事时，叶维丽的一句话发人深省：“这些nice girls怎么会变成murders？”这既是疑问，亦是反思。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与其从人的天性特质角度探索邪恶的心与灵，不如从社会情境中寻求答案。李南央在记录片中回忆起一名好友向她谈起的在文革中施暴时的心理状态：在一间小屋子里，开始时也不敢打，但别人已经开始打了，不打需要更大的勇气。面对“右派”“走资派”，青年人有着正义的旗帜——为革命事业清除阶级敌人，唯有依靠强有力的道德意识才能抵挡住“正义革命”的诱惑。然而此时，个人只是群体中的一员，群体所营造的社会情境早已去道德化，对敌人施暴已然不存在任何阻力。此种邪恶情境的形成，“去人性化”是罪魁祸首。“去人性化”让青年们失去自我，性情大变、冷漠无情，他们心中有对革命理想的无限忠诚，却没有对眼前之人的怜悯同情。在失去人性、失去自我之时，每个人都是集体中的“匿名者”，人类的责任感与羞耻心早已失去效力，为所欲为的施暴反而成为一场集体的狂欢。“这就好比白内障，它能遮蔽人的思考，并促使当事人觉得其他人猪狗不如，认为敌人就应该受到酷刑折磨和歼灭。”^②“去人性化”的结局便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放出了无尽的恶，即使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光之守护神路西法，也可能向恶魔撒旦逆转。

① 马昌海：《文革前的中学生思想教育》，《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② （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三联书店，2010年版，前言。

二、革命死了

谁都知道
是太阳把你们
领走的
乘着几支进行曲
去寻找天国
后来，在半路上
你们累了
被一张床绊倒
床头镶着弹洞和星星
你们好像
是参加了一场游戏
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

——顾城：《红卫兵之墓》

如同尼采的那句惊世之语——“上帝死了”，一句“革命死了”预示着革命信徒们信仰的崩塌。上帝死后，人需要面对人生的虚无；革命死后，人需要重寻人性的价值。革命狂热的顶点，也是重新审视革命的起点。美丽的新世界自始至终只是一场虚幻，在狂热地投身于革命理想之后，人的精力终将耗竭殆尽。面对满是弹洞与虚无的世界，人们产生对自我的怀疑，终于才意识到在这场浪潮中，所谓的革命理想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许多人是在对现实社会目标丧失信心的前提下，开始注意到‘我’的存在的。”^①正如历史学者朱学勤在纪录片中所言：“谁把革命推向万岁的地步，谁就是最后宰杀革命的人。”对革命的反思，恰恰产生于革命狂飙之中。青年学生们为了革命理想，掀起狂热的大串联；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毅然选择上山下乡。然而，在大串联、上山下乡的过程中，青年们真正地参与并观察现实，惊讶地发现革命竟并非想象的那般纯洁与神圣。

卡玛在纪录片中多次穿插电影《牛虻》的片段。《牛虻》是一部关于革命与信仰的小说，曾引起过一代人的共鸣。在影片的末尾，卡玛穿插进亚瑟在狱中对

^① 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三联书店，1993年，第314页；引自：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田园书屋，2010年版，第332页

蒙泰尼里怀有感情的控诉、目送蒙泰尼里远去的画面。如同亚瑟与蒙泰尼里之间的关系，革命理想曾带给青年人虚幻的美好，然而也将他们欺骗与愚弄；他们对曾经为之付出心血的革命理想仍抱有感情，但他们必须与其诀别、回归真实。卡玛用《牛虻》表达出那一代人与革命理想间的爱恨情愁。

人总是习惯于偏狭地以自我为中心看待这个世界，怒斥他人的恶行，嘲笑世界的荒诞，却对自己抱有过高的自信，认为自己决不会掉入同样的邪恶情境中去。因为无知，所以盲目自信，而盲目自信又反过来加深了人类的无知，甚至诱使人类犯下更大的罪行。影片最后的画面以天安门和毛泽东像为背景，配以解说词：“在无数人心目中，革命已死。乌托邦的美景正以新的面貌展现，但毛的幽灵仍在徘徊。每当人们受到压迫并感到绝望，每当异议或抗议被视为非法，毛泽东的身影就可能化为希望的象征，再次激励人们举起‘造反有理’的旗帜。”卡玛有意引导观众去反思那段狂热的年代，反思被异化和歪曲的革命文化与理想。

为什么革命的狂潮最终会吞噬革命儿女？人们又该如何避免再一次以自身的力量将同胞引入地狱？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需要被反思，人类能否以“为了大部分人谋取利益”为名义，对暴力不加节制，对个人的权利不加尊重？是否能够为了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而遮蔽人性、扼杀“自我”？对革命理想的批判并非是要简单否定理想主义，若人失去理想，仅仅存在于世俗利益之中，便会失去生命的意义。然而思想需要节制、理想需要理智，革命理想赋予人存在的价值，却也模糊了虚幻与真实的界限，把最善的道德乌托邦误当作最可行的社会实践，最终将带给人无尽的灾难。革命已死，但反思不止。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命运共存，丧礼的钟声召唤所有人，没有人是座孤岛，可以遗世独立。因此，就像约翰·多恩所说的那样：“请别再问，丧钟为谁而敲响，丧钟为你而敲响。”

【述 往】

是否值得经历的生活？

——李黎黎之死

禾 川

1969年10月下旬，北大荒的深秋。

大田里的农作物已收割完毕，翻耕过的黑土地上夹杂着苍黄的麦茬，残留的豆秸和尚未脱粒的大豆垛散漫地铺在刚收割过的大豆地里。未收尽的玉米地上，枯黄的玉米秆瑟瑟而立，田边的衰草在秋风中摇曳，远处的树林已呈现出褐黄色。

这是一个木本植物落叶的季节，突兀的枝干挺立在寒风中期待着新的繁华；这是一个草本植物死亡的季节，死亡中孕育着来年春回大地时的复苏。

一个美丽的北京女孩选择这样一个季节，用一瓶安眠药结束了自己青春的生命，从此长眠在黑土地下，永不复返。

我在当天傍晚得知这一消息时，如五雷轰顶，心里蓦然一闪：她到底这样做了！我到连队的礼堂兼食堂那儿，看见为她拉棺材的卡车正在外面加水，我决定搭车去她所在的五连。司机说驾驶室里已有人了，要去只能坐车厢里。我毫不犹豫地爬进了车厢，紧靠棺木而坐。

汽车在黑暗中颠簸着，我扶着棺木，一边想象着一个鲜活的生命突然闯进了另一个世界，永远孤独地寂寞地躺在这白森森的棺材里……。

她被安放在木工棚里一个架子上。她的面容是那样平静那样的安详，仿佛仍然在睡梦之中，在我的恍惚中甚至依然保有一丝红润（红润的脸庞是她给我最深的印象）。我无法相信这是一具死尸，不由得伸出手去抚摸那圆圆的脸。那脸颊冰冷、僵硬、惨白！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周围有同学在抽泣，多数人在默默地流泪。我的双眼干涩无泪。有两人在小声议论，大意是说连领导经过商议决定：死亡原因定为“误服过量安眠药”。

她们的谈论让我感到说不出的伤心，眼泪也突然涌上眼眶。我想我是知道她为什

么要“误服”过量安眠药的。这其实是她的选择，是她因为深陷于无法排解的痛苦和恐惧之中而做出的唯一的选择。

她决绝地选择了死亡，弃世而去，一切都抛弃了，欢乐和悲伤，幸福和痛苦，理想和追求，难道还在意一份死亡鉴定吗？

李黎黎，北京（原）师大女附中66届高三（4）班学生。在学校和我同年级不同班，我们因文化大革命而熟悉而成为朋友。在1966年8月1日以前，她因为参加反对工作组的活动而受到严厉的批判，被内定为反革命小集团成员。8月1日以后，那张有名的“第一张大字报”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打了个人仰马翻，反工作组的同学们都得到解放转而成为革命派。但是李黎黎却出现了精神不太正常的状态，经过治疗，到1968年夏天基本痊愈，和我们一起来到了北大荒。

究竟黎黎患的是精神分裂症，还是抑郁症或者是癔症？据黎黎最好的朋友说，当时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鉴定为癔症或抑郁症，认为她神智意识都很清楚。而我们那里团部医院的医生则定为精神分裂症；我最后一次在火车上和黎黎面对面交谈，她亲口说自己患了精神分裂症。我想，在革命高于一切的时代，有关精神性疾病的研究或许是粗线条的。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黎黎因为参加文化大革命反对工作组受到批判和压抑，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所以尽管在我和她最后的交谈中，她亲口说自己患了“精神分裂症”，我现在也倾向于黎黎患的是抑郁症。

在北大荒的第一年——夏天、秋天和冬天，对于李黎黎来说是幸福时光。她浑身散发着青春的热情，她本来就是一个开朗、热情、积极向上的女孩子，她长得也很漂亮，大而圆的眼睛闪动着快乐和友善之光；她无论干什么都带着一股冲劲，她的这股子冲劲在参加营篮球队时给教导员以极为深刻的印象。她个子不高，一抢到球就不顾一切地冲至篮下不顾一切地投篮，被热爱篮球的教导员戏曰为“球滚球”，几乎全营的知青都知道有一个师大女附中来的“李李李”打起篮球来冲锋陷阵得像打仗。

不幸，第二年春她患了红斑狼疮，很快，“精神分裂症”复发，住院，好转，再复发，再住院……疗效甚微。我去团部医院探望她时，一见面她就趴在我肩上流泪叹息道：“我真累呀！”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

听医院里的人说，她住院期间几次躺倒在大街上，又哭又闹地向路人控诉说，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迫害了她。其时，这位最大的“走资派”正备受磨难不久于人世。若论政治迫害，他所受到的相比于她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呢！

考虑到她的病情，在医院领导的建议下，我们营的领导决定让她回北京探亲治疗。这是6月份，我正好也被批准回京探家，就和她们五连另一女同学共同陪伴她回京。

牡丹江开往北京的火车行驶在广袤的东北平原上。车厢里，我和黎黎面对面坐着。她神情恍惚，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向我诉说着她的不幸，从红斑狼疮说到“精神分裂症”。和她同连队的女友一定是听得太多不想听了，一人坐在另一边窗口向外观风景。黎黎毫不避讳自己的病情，只是一再强调她是因“政治迫害”而患“精神分裂症”，因“精神分裂症”而诱发红斑狼疮（女友说她医书看得太多了），一边说一边不禁低声哭泣起来。她的述说中充满了控诉的渴望，控诉迫害她的人，但是她找不到伤害她的具体责任人，这使她很茫然，只好再一次对我说，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她害成这样。除此而外，她还能说什么呢？那位“最大的走资派”早已成死老虎了，但这并不能解除她的病痛！她的痛苦她的愤恨她的悲哀她对自己疾病的绝望全都郁结在心里，无法排解无法释放。

而我也很茫然，除了耐心地倾听，无话可说。甚至，看着黎黎那伴随着痛苦和绝望一并流出的泪水，我心里也不禁产生了绝望之感，一种对朋友的痛苦无力相助的绝望。

在那个年代，“政治迫害”的确比比皆是。小到用一张不署名的大字报就把某人说成“阶级敌人”，大到揪斗批判，精神折磨加肉体折磨，连国家主席都难以逃脱。

1966年6月，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17日，高三（4）班包括李黎黎在内的13人贴出了质问工作组的大字报，随后学校里又有许多人选择了反对工作组的立场，形成了三个反工作组小组，成员以干部子弟居多，李黎黎是她们班反工作组团队的领军人物之一。这些女孩子的作为是不是政治正确我不想评说，但是，她们都是怀着一种纯真的革命理想而勇敢地站在了少数派立场。她们很快受到工作组领导之下的全校性的批判和压制，她们在学校里被孤立，在各自的班级里被批判，精神几近崩溃。一位同学在三十多年后告诉我，当时甚至有同班同学用硬物击打她的头。此话很让我吃惊，我一直以为我们读了十二年书的人已经成年了，再怎么也不至于殴打自己的同班同学，何况还没有到一片混乱之时呢。

7月7、8、9日三个半天，工作组连续召开辩论会（实则批判会），辩论的主题是反工作组是不是和工作组争夺领导权。如此，7月初三个反工作组小组都被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工作组匆忙撤走后，在遗留的文件纸片中，有同学发现了某高层领导对工

作组的指示，三个小组中的领军人物被内定为反革命右派分子，待运动结束后发配劳改！

我无力对历史问题作研究，我现在认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天真单纯而且持一元化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反工作组的还是拥护工作组的，都认为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实际上不过充当了上层政治斗争的棋子而已。

反工作组的一个多月里，李黎黎陷得太深。革命的情结和被打成反革命的压抑感围绕在意识里难解难开，加上她的父亲在文革前因为残酷的政治斗争而自杀，在那个革命的年月里，人们对政治斗争中的自杀者总是要不依不饶地补上一个“自绝于……”的标签，这使她的内心压力更大于别的人，难以承受。虽然从“反革命小集团”变身为革命派了，黎黎的精神却处在崩溃状态。

火车奔驰着，窗外忽闪过一片片的绿色，生命的绿色；黎黎继续诉说着，另一位女友在那边窗旁睡着了。

1969年3月，黑龙江珍宝岛发生了中苏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很快传到边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地处“战争”的前沿，气氛格外紧张。

黎黎说：“我真希望赶快打起仗来，希望打仗的时候能上前线，只是我身体不好，怕他们不要我。”

我一时不明白她为什么渴望战争？虽然革命的口号天天被我们喊在嘴边，但是作为一个人，一个普通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政治家军事家，没有谁会在心底里真的盼望战争。

黎黎却真心地渴望战争来临，尽管身体虚弱，她还是希望成为一名战士，能够奔赴前线英勇战斗直至牺牲。

她用一擦洁白的卫生纸代替手绢捧在腮边，她那圆圆的大眼睛低垂着，长长的睫毛下不停地滚出一串串晶莹的泪珠，泪水几乎覆盖了她的整个面庞。她嚤嚤地哭着，哀哀地说着：

“我害怕苏修打过来的时候自己当了俘虏，万一我正犯病，控制不了自己，我怕我会投降，会变节，会变成叛徒，那样的话，我不如现在就自杀算了。”

她的这段话令我惊骇，也令我至今不能忘。

我突然明白她为什么渴望上战场了，她渴望的并不是战争，而是牺牲，是死亡！“精神分裂症”和红斑狼疮已经使她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对“投降、变节”的恐惧更

加剧了她的绝望，她似乎注定要死亡，能够选择的只不过是死得光荣，死得伟大，或者至少死在自己不幸成为“叛徒变节分子”之前，死得平凡而不要死得耻辱！

我愣了一会儿，立即搜肠刮肚，找出一切能找出的理论去劝慰她、开导她甚至批评她，希望她能摆脱这些荒谬的想法。最后甚至摆出一付严肃的神情对她指出，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等于叛变！黎黎，你要相信自己，你是个好同志，你是要革命的，你是不会在战场上叛变投敌的……。

呜呼！今天我才明白，我当年的那些时髦话语是多么的空洞可笑，多么的苍白无力！那时，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解开缠绕在她心里的恐惧和担忧。

如果黎黎在天有灵，我愿意对她重新诉说：

黎黎，你是一个好姑娘。你美丽，热情，落落大方，积极向上，周围的人们都爱你。想想在学校时，工作组撤走了，我和一些同学在校门口遇到你，我们坐在一堆聊天，你是那样的友善温和，既没有革命派的傲气，也没有对我们这些跟风者的积怨，因此我才视你为一个好朋友。黎黎，你尚未体验恋爱的甜蜜，为人妻为人母的幸福，生活尚未向你展开美丽的一面，你为什么要离去？

四十多年了，你孤独地躺在遥远的黑土地之下，只有白桦林和你做伴。春天，可有人为你培土？秋天可有人为你拂去坟上的落叶？那未开垦的处女地像你一样纯洁，色彩斑斓的白桦林像你一样美丽，只望它们能永远伴随你，切莫被毁林开荒让你孤魂难觅归宿……。

我们在北京站分手，黎黎的叔叔和妹妹到车站接她。一个月后，我休假期满归队了，北京站成了我们的永别之地。

夏天过后是秋天。深秋初冬之际，黎黎病愈结束治疗回到了她的连队。连里的男女知青几乎全体出动，到百里之外的迎春火车站去迎接他们的伙伴。这浓浓的情谊温暖着黎黎的心，却不能解开她心里的症结。

当晚，兴奋的交谈渐渐停息后，黎黎说了她的最后一句话：“我可该好好睡一觉了。”

四十多年了，每当我想起李黎黎之死，伴随而来的必然是一组可怕的词汇：“叛徒、变节自首分子”。因为在那时，这个词也正随时准备落到对我父亲的判决书上。也许这也是我对黎黎的死永生不能忘记的一个重要因素，她那覆满了泪水的面庞，她那悲哀的诉说：“我害怕变成叛徒”，在我是刻骨铭心的记忆，还有忍不住的追问，为什

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1967年7月23日，广州空军副司令安志敏将军在全国上下大举查找揪斗“叛徒变节自首分子”的热潮中，在自己家的楼上，用手枪对着太阳穴结束了戎马倥偬的一生。

安志敏参加过四方面军的长征和西路军东征，是1937年春天突围逃生到新疆的四百多名西路军官兵之一，是革命军队里最早的飞行员之一，驾机参加过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阅兵仪式。1942年，安志敏在新疆航空队时，同陈潭秋、毛泽民等人一起被军阀盛世才抓捕入狱，后经营救平安出狱。

安志敏曾是空五军军长，他相貌儒雅，雍容大度，是大院里那些勇武好斗的男孩子和“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女孩子们敬仰的对象。在杭州时，他们一家和我们一家是两代人的朋友，我的父亲和他是西路军的战友，他们都经历过艰苦的长征，他们生死与共，从红柳园子突围到星星峡，他们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捕入狱；安家的小儿子是我弟弟的同班同学、好友，可爱的小女儿和我的妹妹形影不离像一对亲姐妹。就在安志敏自杀的前一年深秋，我借“革命大串联”的机会还到广州他们家里小住了几天，那时，安志敏将军仍是一副飒爽英姿，他的夫人温静娴雅，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而不是热情的革命者。那时我已经迈入成年的时段了，我对这两位长辈有着说不清楚的倾慕，万万没想到一年之后他们会有家破人亡之灾！

安志敏将军自杀时，中央文革尚没有成立有关“新疆监狱叛徒集团”案的专案组，他也还没有被扣上“叛徒变节分子”的罪名，他还是副司令，还有一把手枪可以痛痛快快地一死了之；但是3月份的一纸文件（关于61人叛徒集团案）给所有为革命蹲过敌人监狱的干部敲响了丧钟，安志敏预感自己难逃厄运。一个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将军，没有死在西路军严酷的岁月里，没有死在盛世才的监狱里，最后死于被定为“叛徒”的恐惧，怎不令人震惊？这个万劫不复的年月！

我听到噩耗后曾给安夫人去信表示慰问。夫人回信说：“安志敏自绝于党和人民后，我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拯救了我，……在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我决心和他划清界线，振作起来重新做人……”

当时捧着这样的回信，我傻乎乎地不知道该作何想，我不知道应该为她的“新生”而高兴，还是为安志敏的“自绝于党和人民”而愤怒？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封回信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每每令我心痛，令我一点一

点地产生了欲哭又无泪的感觉，直到现在我坐在电脑前，仍然有痛哭一场的愿望。我已忘记自己去信的内容，是不是也写了“自绝于……”之类的堂而皇之的革命话语？如果是，那我心里的痛不但有哀悼更有负罪之感，他们是恩爱夫妻啊！一个温婉柔弱的女子在受到如此打击时，在给晚辈的私人回信中都不敢表示一点点哀痛，还要感谢这疯狂的岁月这灭人的路线！

1970年夏天，我父亲的专案组长托一名知青找到我，告诉我对父亲的审查已经结束等待上报结论，“叛徒”及“苏修特务”的嫌疑都已经撤销。这位好心的专案组长怕我背着思想包袱，更怕我们一家因受连累会对父亲有怨气，所以在调查报告正式出来之前就托人给我通气。

我虽然是顶着“可教育好子女”的帽子去北大荒的，但也很少去想父亲是不是什么“叛徒特务”，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没有更多的欣喜之感，心里反而充满了苦涩和悲哀，因为我想起了死去不到一年的李黎黎。

黎黎，你为什么要“误服过量安眠药”呢？我的父亲，他在抗战中做地下工作被日本人抓捕过，安志敏将军，曾在国民党监狱度过艰难的岁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疯狂的年代无法逃避被诬陷为“叛徒”“变节分子”的厄运，而你，你怎么会是叛徒呢？你和“叛徒”这两个字毫不沾边呀！也没有任何人怀疑你会变成叛徒，可是你还是走了，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深深的恐惧走向天国。

1999年11月一稿

2004年10月二稿

2014年7月三稿

写作后记：

李黎黎的父亲曾是公安部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反右倾运动中遭受不公正批判自杀身亡。哥哥曾是外贸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期不知因何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反革命组织小头目，自杀。

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我死去的朋友李黎黎，在她十几年所受的教育中没有真正的哲学，只有革命和阶

级斗争。当她感到自己不可能成为革命者甚至也许会成为革命的叛徒时，生活对于她来说就不值得经历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因备受折磨而轻生，有人因笃信“士可杀不可辱”而死。我的朋友李黎黎，虽然在文革初期因为反工作组而受到压制被定性为反革命，但是工作组很快就被否定，被打倒，此后，黎黎再没有受到折磨与侮辱，但是她自杀了。

我这样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从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9年10月底黎黎服过量安眠药离开人世，她这三年多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朋友圈里。学校里反对工作组共同承受了政治压力的同班同学——战友，她们不承认“自杀”说，她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亲密的朋友死于“愚蠢而荒谬”的自杀，她们甚至对于“误服过量安眠药”也表示怀疑，对此我深表理解。而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里朝夕相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知青同学——“荒友”，则确信黎黎是自杀，所谓“误服”是连营领导出于政策上的考虑而做的结论。很遗憾这是四十多年前发生的事，太遥远了，于今争论不休，恐怕黎黎天堂有灵会受到惊扰。

虽然黎黎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不在她那个连队里，但是在这之前我和她有了一段旅途中的亲密接触。她向我倾诉心中的痛苦，所以我把“自杀”保留为我个人的看法。而且，时至今日，我绝不认为一个人在那样的环境里选择自杀是愚蠢而荒诞。更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她的死让我永生难忘。年年月月，我在心里呼唤她，追问她：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述 往】

插队的那些事（三）

——男生·女生

朱 特

分配到雨村的插队落户知青男女各10人。如此分配让我隐隐感到政府的良苦用心。也许政府很单纯，是我想多了。到了雨村之后，贫下中农们却和我想到一起去了。贫下中农们很实在，告诉说这就是让你们成家家哩。最初的话题之一就是乱点鸳鸯谱。后来他们发现女知青不是男知青的“法定”的未来配偶，雨村的后生也可以成为女知青的候补郎君，这样的玩笑就少了。后生小伙子们有意无意向女知青靠拢表示亲近。

刚到小营子时国家拨给大队的盖房款还没到位，知青们就借住在老乡家。男知青住在光棍汉九和家，九和的房就在小队部的后面。女生的住处和小队部并排，但隔着一道长长的墙，是一户村民的耳房。小队派了一位老汉给我们做饭，食堂就设在小队部。

每天吃饭时男女知青都排着队从各自的住处出发，到了“食堂”先行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的祷告，然后再进食。每到这时就会围上一圈看稀罕的村民。时间一长，老乡们看到京城来的娃娃们吃饭和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同，人就稀少了。知青们也覺得把小队部当食堂不方便，提议挪到女生宿舍里，队里也同意。这样女生宿舍就又兼了知青食堂。

每到吃饭时，一位女生就会站到她们宿舍的房顶上（有用土坯垒成的台阶，很方便）喊一声：吃饭了。男生这边就“噢”一声应答。然后一行五条汉子绕过小队部长长的院子去吃饭。一直到后来知青自己做饭，还有这样的情形。这成了小营子的一景，老乡们来不来就学着喊两嗓子和我们开开玩笑。

第一年插队，我们还是吃国家的商品粮，每人定量可能是40斤。那时，男女知青都是当吃年龄，有道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何况那时油水少，粮食不够吃是一定的，最初时不到月底就没有粮了，只好先从小队里或是村民那里借粮

果腹。在吃食上男生比女生吃得要多，女生碍于情面也不好当面说开，但矛盾的种子却种下了，为日后男女知青分家埋下隐患。缺粮的情况其实并不长久，因为到了冬天知青们回家猫冬都不把粮票支走，这样有两三个月的口粮省了下来以补来年的不足。

雨村男女知青的关系有点特别，和别的村子都不一样。我刚到雨村时与女生不认识，自然无话，那些老高三的兄长们同我一样和女生们也不搭腔。我以为时间长了就不会这样了，但是我在雨村的三年时间竟然没有多少改变，就像学校里男女同学之间划着“三八线”，界线分明，无正事、公事不相往来，恪守着“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如果男女生之间有什么事要接洽，一般情况下都是二人以上结伴去和异性接触，而且一定是在阳光之下。但那时雨村男女知青是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一天三顿饭都在一起吃，生活和劳动也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依然保持着那条“三八线”。这就有点奇怪也有点微妙，连别村知青来串门也感到可笑和奇怪。

那是个可以生孩子却不可以谈恋爱的年月，谈恋爱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是十足的败坏社会风气的下流举动。那时候的城市街头哪里像如今，男女小青年又搂又抱又啃把闹市当成自己的卧室，路人也视若无睹习以为常，那会儿手拉着手的男女青年在大街上走就有可能挨揍。舞台上的样板戏男的没老婆女的没男人，好不容易阿庆嫂有了个阿庆，还去跑单帮了，让阿庆嫂在春来茶馆守活寡。那时谈恋爱多半是地下工作，悄悄地干活不能让别人知道。这样的大环境无形中也束缚了男女青年的交往，雨村知青概莫能外。

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制约了雨村男女同学的正常交往，即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学校：女知青来自女校，男知青来自男校。我是个异类，来自男女合校，可我的班级却是男生班。在校期间与异性交往可能都有所欠缺，或说经验不足，“丁猛子”把大家“攒”到一起难免不适应。但，这个适应期似乎也太长了些。当年到雨村时知青已经不是小毛孩子了，大的二十出头小的也有十七八了，都是成年人了。按人之常情这个岁数正是对异性最为敏感，老辈子人的说法这个年龄也是谈婚论嫁的岁数。敏感的年龄段加上一个特殊的氛围，我那时的感觉如果和女同学走得近了就会有好多双眼睛看着你，心里没有鬼也就有了鬼。

当年有一位到村里串门的知青曾有过议论，大意是雨村男同学中间存在着一

个“场”。这个“场”造成的效果是男同学不能与女同学接触，一接触就会受到男同学的嘲笑与讥讽，就会说你拜倒在石榴裙下了，让人很没有面子。这个“场”把六尺男儿都“箍”住了，不敢越雷池一步。他说得不无道理所以我记住了。女同胞那边是否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场”，我就不得而知了。

对男女知青之间过于敏感的关系是我们的“情商”太高了还是太低了？只能这样理解，在雨村插队前三年男女知青们的观念还没有走出校园。这方面老高三的表现比女生更强烈一些。在雨村的男女知青之间的关系中他们占有主导地位，起着左右形势的作用。

我记得这帮老高三给女同胞起“雅号”的情节，十足是学校里的小男生对小女生的作派而不是走上社会的男同事对女同事的态度，学生味太浓啦！这帮老高三的兄长们一个个智商很高，但“情商”却还停留在初中生阶段。究其原因可能就是他们受到“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完整的教育吧。

我还以为两个学校的差异也是一个原因。多年来女同胞们一说起当年的话题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男生看不起我们”。可男生却从来没有承认过。但老高三们日常生活无意中的言谈举止表现出的名校意识让女同胞的感觉不好。被“看不起”的女同胞的自尊心可能有些不太好受，所以不上赶着搭理男生也在情理之中。说起雨村的女同胞，我从来没有敢“看不起”过，可以说只有佩服。到雨村第一天欢迎宴罢，把我们去小营子人的行李都装上大车后，一位女同胞手举长鞭欲驾三套马车的英姿依然在目（可把当时的车倌吓坏了），小营子的女同胞在大口井里游泳移风易俗之举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与大营子女生西去兵团也结下了“战斗友谊”；就是与女同胞分家吵嘴，她们的伶牙俐齿也让我折服。这些也许都算不了什么，雨村中的妇女不是什么活计都下地的，但插队雨村的女同胞却很少缺工，从未经历过农村生活的她们付出了比男生更多的辛酸与打拼而有尊严地走过来了。

我还猜想，女同胞们在雨村的最初阶段有意无意表现出来的当年革命小将的激情，或许让“七个老右派”有所顾忌？

力兄把我们知青小组称之为“饭团”，我们哥几个点头认可。雨村的男女知青关系虽“僵”但不“硬”，这便是微妙处了。一个锅里起伙的知青们总还是团结互助，出力气的活男生就主动担负些，一些琐碎小活女同胞就多揽些，知青户

里有什么事大家商量着做，总之还是一个和谐的“饭团”。有了这个“微妙”便成就了这几十年的友谊。其间虽然有过“圪杈杈”，也算是知青户里的小插曲吧。再贫瘠的土地也会开出芬芳的花朵，再青涩的青春也会结出爱情的果实，只要有青春的存在就会产生心灵碰撞的激情。雨村男女知青表面静如止水，下面却是暗流涌动，有道是看似无情却有情。只不过愚钝如我懵懂无知，所以当力兄与新国同学的爱情花朵在阳光下盛开时，犹如一块石子投如入平静的湖水中激起层层涟漪，我惊奇他们的保密工作是咋做的，平日里根本看不出丝毫的蛛丝马迹呀。服了。时过境迁，现在很想知道当年是“黑土”追的“白云”呢，还是“白云”先向“黑土”抛出了绣球，秋天的菠菜是谁个先送出的？“千年修得共枕眠”，这就是缘分。

【述 往】

安希孟回忆录(二)

——困难时期

安希孟

五十年代初，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倡导新富农经济。我家得到实惠多多。这应该是开国后较好历史时期。互助组初级社社员见我们便讽刺呼曰“单干户”，似乎是“落后分子”的别名。今天看来，中农家庭，家道殷实，土地广袤肥厚，善于耕作经营，有车马犁耜，小康殷实，可以不依赖集体力量。

当时有这么一首流行歌曲：“三头黄牛一匹马，不由得我赶车的人儿笑哈哈。往年那个车呀，咱穷人没得有呀。今年呀嗨，大轱辘车呀，骨碌碌转呀，转呀转呀，转到了咱们的家。”

这首歌唱的正是我们家。那时我家院内槽头兴旺，打麦扬场，麦秸堆我家最高。这可能是家业最红火的时期。50年代前叶，我们一年到头全是白面。田头高粱，祖母用来喂食牲口。玉米棒子煮着吃，玉米面做面干，做散饭，调剂生活。后来不幸玉米面成为主食。

有一年棉花丰收，卖完之后父亲扯回洋布，买了案板（杏木），擀面杖，锅铲，全家喜气洋洋。记忆最清楚的是，爸爸这次为妈妈买了件毛衣，开天辟地第一次。我家后来还盖建瓦房三间。足见我家是三马一犁一车式过渡时期经济受益人。

50年前后，冬天，山上的农民用毛驴驮运煤炭下山换钱。当时平原农民能够烧煤的很少，出售煤炭赚钱就比较困难。山里的农民一人赶着几头毛驴，三四个人七八条驴鱼贯而下，面孔是黑的，衣服是破的。他们很少吃到白面。下山后我家是憩息的第一站，他们照例在我家歇脚，讨口水喝。看到我们拿的白面饼子，就对祖母说，“大娘，给我们吃一块饼子吧”。祖母每次瞪着眼睛暗示我们吃饼子要躲开他们。有时把我们往身后藏。可是幼稚的我们反而越是有人越是饿，每次见到生人反而故意当面讨要饼子吃。

六十年代中前期，农村破除旧风俗。此时，伯父担任生产队长，也开始破除封建陋俗。那时候，闹洞房还保留野蛮落后低级下流习俗。伯父严厉制止此等野蛮落后习俗，不遗余力。可是传统积习，断难革除。

父辈五人中只父亲上了五年学，为的是有一人断文识字，免受欺侮。父安受祐，字福艇，在棉花收购站打过工，参过军，当过小学教员、乡政府公务员、生产队会计。1948年父从军，未几回乡，先后任小学教员和程公乡政府文书。任乡文书时，父亲负责救济粮审批。春天青黄不接，常有饿民啼饥号寒请求补贴粮食。父亲总和颜悦色温软相待，但他毕竟不是救世主。

五八年，群众谁若没出工，大队就让我父亲用绳索捆绑，父亲和悦地说，“人家让我绑你，咱们摆摆样子吧”，把绳子虚套在那人身上，类如五花。五八年大炼钢铁，哥哥上初中一年级，白天挖矿砸石，晚上开会，迷瞪，犯困，神经性头痛，休“学”回家。可是六零年民生凋敝，哥哥还访三朝元老们忆“苦”思“甜”歌“功”颂“德”！

母黄桂兰，和于娣姒，于卑幼有慈爱，贞静贤惠。也许因为娘家只有一个男性后代，她对舅舅格外垂爱。50年代初，每年春节，她都薄备酒馔，宴飨舅舅。每次四个碟子：凉拌豆腐、莲菜、冷盘猪肉、炒鸡蛋，招待上宾贵客的标准。舅舅后来作了政府公务员，反而没了这个规格，每况愈下。村子里普遍习惯，招待贵客是酸汤面，外加金黄色炒鸡蛋。

妈妈重男轻女，几个姨姨都有些怕她。我感到内疚的是，妈妈对调皮的我比对妹妹好。妈妈每次生气打我，我急遽跑进羊圈（羊被赶到外边吃草，羊圈垫铺新土），迷信的妈妈认为女人不能进羊圈，我就逃过一劫。妹妹没那么幸运，经常挨妈妈的打。只有父亲呵护妹妹。因此之故，妹妹喜欢离家到外边玩，我则经常骂妹妹。想起来怪后悔的。

60年，瓜菜糊口，啜菽饮水^①，母亲每日参加集体劳动，不一会儿衣袋内重重裹藏胡萝卜潜回，旋即折返。嗷嗷待哺之幼子，方得存活！母亲还经常凛冽寒风中到沟壑捡拾“煤核”。我家屋后头旧园子，自己可以种棉花种粮食。这块地几经易手，归了集体。

① 啜菽饮水，啜，chuò，吃；菽，shū，豆类。饿了吃豆羹，渴了喝清水。形容生活清苦。

合作化以后，我家子女多，生活渐不如昔。大约57年，外祖父可能发过牢骚，就是屈原的离骚，批评现状，叫颠二话。大队开辩论会，实为批斗。主持者故意让我父亲做记录。父亲始终埋首，一夜没有抬头，心里五味杂陈。阶级斗争，何其无情乃尔。他是贫下中农，也难逃斗争厄运。

那时家家房前屋后多有“园子”，应该是菜园子之省略。困难时期得到六十条保护。园子，后来就种粮食或棉花。我家屋后的园子一度私有。张家、阎家、孙长仁家都有，可以弥补集体经济之不足。这大概就是后来被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园子属私宅，北方农村亚细亚生产方式遗存，家族共有，不属于野田。我家园林桐树园后被归公。

六十年代，我家也有养殖产业，饲养一头母猪，每年产十余头猪崽，一窝而已，能挣几十元，补贴家用。冬天到集体麦田拨开厚积的皑皑白雪，偷拔被覆盖的青青麦苗，那是猪的美味肴馔。储藏干棉花叶子，干蒺藜（刺刺），开水煮过，上撒米糠，就是猪的美餐。猪抢着吃米糠，我总用铁勺击打它的头部，示意要匀着吃，不要顾前不顾后。泔水，洗碗水，喂猪，现如今叫垃圾猪。猪在粪堆上吃人的大便，但猪不吃自己的大便。到邻居家（安儿）收取洗碗水，用料桶挑担，是我的份内。

1960年冬天的一天夜里，饿极的母猪拱开院门到集体地里吃冰雪覆盖的绿麦苗，地毯一样下面，麦苗儿郁郁葱葱。母猪遭二饿狼攻击。狼不能当场击杀母猪，欲挟持大猪到偏远处，终难得逞，但在猪肚皮上咬（或抓）破一处创口。猪奋力抗争呼叫，半夜，极凄惨，声闻一里，一村民呼叫，吓跑了狼。雪地上兽蹄印表明两匹狼逼着猪来回两趟，显然动脑筋的狼要逼迫猪远离村庄，猪则着意回家。双方皆是动脑筋急转弯呀。母猪回到家不久“撒腿猪寰”，宰杀的猪肉还特别给呼喊的村民送了二斤。

记得合作社以前，每有死猪死鸡，辄深埋树根下——但困难时期，病死骡马，社员亦争先恐后按人头分食。

那时，家里子女虽多，但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妈妈总也改善生活，不让子女受委屈。秋天旋柿饼。柿饼工序繁杂，几次晾晒，捂盖，令其长白毛（俗称“霜”）——一种富含营养的菌类。冬天储藏软柿子，做摊馍，用软柿子搅拌稀糊糊面做“油圪嘛（青蛙）”，做炒面（炒黄的玉米、谷子、黄豆，磨成面，和以软柿子，

晒干，磨面粉），过年备馅，纺线织布，纳鞋底，备衬子。过年吃饺子，嗷嗷众口，稚子待饭，父母只能最后吃点面条。平日吃面条，我们顾前不顾后，最后父母吃点汤面，已经没有菜，菜被我们狼吞虎咽了。

妈妈病重的时候，襁褓中的幼弟忽然不吃奶，因为奶的质量已经不同。婴幼儿已经不喜欢濒危的母亲的体味。他头也不回地跟随婶母而去，没有常见的缠绕母亲的哭闹。母亲用干涩的眼睛注视他。

母亲生养多，以此减寿。旧传统产妇坐月子，只能喝小米稀饭，不能吃这吃那，没有水果，没有蛋奶，没有鱼肉，没有鸡汤鱼汤，不能和常人一样洗浴。她是旧观念的牺牲品。她没有就医于现代医学。传统旧观念，妇道，贤慧勤苦，戕害了母亲。

母亲去世后，父亲孑然一身。丧偶，委婉语叫失家（没有母亲的家是残缺之家），没有倾诉。弟弟希文懂事，经常摘几个桃子送到孤独的父亲居住的小屋和他聊天。没有妈妈，我们哪还有家呀。

父亲不申请入党，不参加工作。姨表弟学大人口吻说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我一直纳闷他何出此言。父亲一生惟谨慎。我读高中时，一同学作文用阶级斗争观念批判王定一老师修正主义观念，说他“讲授屈原离骚乃传播封建观念”。我却与时局唱对台戏，据理予以反驳，维护该师，自以为敢想敢说敢斗。党团书记支持对老师的批判。寒假父亲看到我文章，勃然怒曰：“卷铺盖回来！”盖因父亲慑于当时风雨满楼，担心我“惹事生非”——文革时，翼县中学果然贴出批王定一师的大字报，其中指涉到我。吾则少不更事，犟不惧虎。览文至此，诸君应知64、65阶级恶斗情景。

1964年，爸爸让常冠军叔叔书写条幅贴在家里：“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字体娟秀，很是紧跟形势。他们也捕捉到凛冽的政治气候。

【资 料】

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一）

编者按：这里刊发的是曾经保存于戴煌先生档案袋中的右派材料。材料名称是《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材料封面有新华通讯社党委办公室整理材料的工作人员吴旭的签名，和“22/11”（1962年11月22日）的笔迹。

1979年前后，戴煌的右派问题“改正”后，出于对戴煌廿一年苦难的同情，新华社国内部工作人员段丽荣女士私下将此份手稿材料交还给戴煌本人。段是新华社国内部1978年临时组建的右派问题平反小组工作人员，负责戴煌右派反党小集团案件的甄别工作。

2008年，段丽荣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上级通知销毁右派分子档案中的一切不实材料。根据此通知，当时所有的“黑材料”，均从被整肃干部的档案袋中抽出，统一送到新华社锅炉房，由专人监督，用三天时间，全部烧毁。

此材料共分四部分：（1）说明；（2）右派分子戴煌的政治结论；（3）戴煌1962年应新华社国内部领导要求所写“回顾我这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4）戴煌关于“回顾我这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的补充材料。这四部分材料中的第二部分“右派分子戴煌的政治结论”在退还时即阙如（估计已被销毁），其余尚完整。为保存历史资料，本刊将陆续发表所余手稿部分。

一、说 明

戴煌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受撤销职务、监督劳动处理。曾在黑龙江850农场劳动两年零八个月。去年（1961年——《记忆》编者）九月分配到国内部资料组工作。今年六月间，他以《回顾我这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为题，写了一份约八九万字的翻案材料□□党组，不承认自己是“敌视党和仇视革命的右派分子”，不同意结论中所列举的若干事实推演出来的论断。他在这份材料中继续坚持过去的一系列的反动观点，并发表了许多新的攻击党的言论。十中全会（八届——《记忆》编者）公报发表以后，他在十月间又写了一份

补充材料，作为他“对于错误本身的批判，以及今天对若干问题的认识。”在这份材料中，继续暴露出了一些反动观点，仍然坚持“不能承认自己是个反党、反人民的分子。”为了便于领导上和有关同志研究和处理他的问题，特将这两份材料印出，并同时印出反右派时对他所作的政治结论。戴煌所写《回顾我这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全文很长，印出时对文中第二部分他在东北“劳动期间的表现及问题”略去（共约四万多字），只保留了文中的小标题。

党委办公室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①

三、回顾我这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1962年戴煌的十万言书

党支部并请转总支及党委会：

五个月前，我在写回顾这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时，为了分析我究竟是不是居心搞反党反人民的分子，只着重地说明了我的主要错误观点的形成，劳动过程中的思想演变，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对是非曲直、善恶明暗的态度；而对于错误本身的批判，以及今天对若干问题的认识，则写得不够明确。我觉得有必要做一补充。

在我过去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和错误言论中，最主要的乃是“个人崇拜”和“特权阶级”两大问题。经过这几年来的反复思考、分析批判、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研究，我终于发觉：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立场观点偏颇和政治经验不足，对若干社会现象的观察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故常常视局部为全体，认虚表为实质，把客观发展之必然当作人为的主观臆造，并急于将理想变成现实。从而，我不得不到处碰壁。

近年来，我就摘编“毛泽东语录”的工作之便，对毛主席公开发表过的著作和言论作了初步学习研究。越是看得多，就越想得深，越要省问于己：毛主席究竟有无“个人迷信”？最终的回答：没有。

^① 原稿“说明”段字迹为当时处理戴煌问题的具体经办人员笔迹。

第一，我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在文字上见到过：毛主席希望别人歌颂他、赞美他、突出他、崇拜他，将全党的功绩，统统记到他的名下。恰恰相反，他一直告诫全党要永远谦虚恭谨，力绝自满骄矜；全国解放时，他又具体规定不准给党的领袖祝寿，不准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工厂、学校、城镇、农庄。对于这些指示以及对这些指示的执行，是全党全国有耳共闻、有目共睹的。

第二，我没有看到过，也没有听说过：毛主席凡事皆唯我独尊，孤行其是。相反，他一向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多听不同意见。如遇有实属错误的异议者，他也力主“以理服人，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即使错误严重，不得不给与纪律制裁者，他也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反对“一棍子打死”。

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是这样说，而且一直是这样做。对待所有犯过严重的路线错误的同志，如王明、博古、李立三等同志，毛主席都是坚决主张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并且继续重用了他们。就是对张国焘、高岗等人，他也竭力想把他们留在党内，示以光明之路；后来只是由于他们自己以投敌、自杀的背叛行径，证明了他们是不可药救（原文如此——《记忆》编者）的败类。今天，对于那些真正犯有反党、反人民罪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那些在思想观点方面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包括我这个对主席本人也有怀疑和不满的人在内，毛主席也没有下令斩尽杀绝，而是示以教育改造的方针。这比起那种动不动就叫“人头落地”的无以挽回的过急之举，显然是正确的、明智的，合乎道义和厚利于革命的。所谓“个人专断”，“神圣不可侵犯”一说，是没有根据的。

虽然在劳动教育过程中，很多人毫无必要地死去了，活着的也受尽了折磨，饱尝了人生的一切痛苦；但是大家都明白：这不是党和领袖们的过错，而是一些错误的领导者和若干坏分子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的结果。正是由于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确的，所以一经发觉实情，立即予以纠正，大多数人才得幸生还。

第三，我同样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到过：毛主席自称为最正确，从未发生过任何缺点和错误。相反，他一贯强调：任何人都会有缺点和错误——这显然包括他自己在内，只是性质、程度和对缺点错误的态度有所不同罢了。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毛主席就现身说法地谈到了他自己进行思想改造的经验和逐步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而没有自奉为至贤至圣。在《农村社会

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里，谈到做工作上的某些缺点错误时，毛主席就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央也有责任，不能都怪下面。在公社化后的郑州会议上，他说过“感谢五亿农民，他们的瞒产私分教育了我”这样的话。据说在今年上半年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毛主席说：“这几年，我们做了不少蠢事！”心情十分沉痛。诸如此类的事实都说明：毛主席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模范，而不是那种片面地维护个人情面与威严而掩掩盖盖的人。

正由于毛主席是个英明、正确、伟大的革命领袖，在为人方面有堪为他人的表率，所以他才获得了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爱戴和热情的歌颂。我过去由于个人民主自由思想严重，在所谓“斯大林事件”的混浊思潮的冲击下，失去了自持力，把这种出于人民内心的歌颂和爱戴，与那种有意地、自上而下地培育个人迷信，以及个别人的阿谀逢迎、浮夸取宠的可耻行径混淆不清，进而在所谓知己的小圈子中，相互散布了对他的疑虑和不满，在给他的那封长信上，居然还用了“上帝”之类的字眼，这一切显然是极端错误的！

今天，我虽然还有一些极为次要的不同意见，但已不再狐疑忧伤，怨天尤人。首先，我已认识到：生活是负责的，微妙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一下就看透万千现象的本质。党所以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外乎为了辨别是非，找到真理，而不是无理取闹，独树一帜。这就需要人们在大胆地想，大胆地问，大胆地表述自己的观点的同时，不要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如果个人的看法与党的或大多数同志的看法有所差异，就应该诚恳地、虚怀地与他人探索研究，尽可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坚持自己的确认无误地看法，又要准备随时随地都放弃自己的意见，服从真理。这是我今天对一切问题所取的态度，而且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其次，我也能够理解：某些问题的产生，与我们的制度、党的领导和毛主席本人是不相干的。譬如说：对毛主席的歌颂中的所谓“过分”，多半是由于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感激、热爱和信赖才产生的。当人们真诚地赞叹一位英雄或伟人的时候，常常会倾吐出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最好的字眼，其赞美之词的分量，往往超过被赞美者的全部功绩和道德表现所实有的广度和深度。这在古今中外是常有的事。如果说，这当中有了所谓“崇拜”、“迷信”、“过分”，那也是十分真挚和十分自然的。毛主席作为伟大而又谦逊的领袖，他固然

无权要求人民歌颂他，但也无权要求人民不歌颂他。对于人民对他的这种热爱，他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据说，开国当初，有人在他面前谈论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激情时，他就这样说过：“这哪是对我个人的呀，而是对我们整个党的啊！”

至于某些人的唯唯诺诺胆怯无能，某些人的欺上压下，哗众取宠，那完全是阶级社会残留下来的腐朽意识的反映，也与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一向受到党和毛主席的坚决反对。

在这个问题上，我唯一需要重申的是：在“个人崇拜”一词把我搞得糊里糊涂的时候，我也没有完全否定毛主席的英明、正确之处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今天，我当然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毛主席是现阶段的历史所可能给予我们的最理想、最伟大、最富有天才的领袖。正是他，领导我国人民清除黑暗势力，摧毁了残暴统治，粉碎了愚昧、落后、贫困、羸弱的枷锁，向光明美好的境界走去；正是他，继马克思、列宁之后，高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鼓舞全世界革命的人民英勇奋斗，争取早日把理想尽成现实。不管在这当中，曾经有过或将会再遭遇到多大的困难与挫折，人们决不会后退犹疑；他们将步步前进，步步胜利，直到红旗插遍全世界。

“特权阶级”一词的使用，也是十分错误的。应该认识到：全国胜利后，党与国家对很多同志的生活待遇的改善与提高，基本上是合理的，是符合社会经济规律要求的；一些规模盛大的宴会、酒会、游园、联欢等等的交际活动，也在根本上为国家的利益所必须。我所呼喊的“消灭悬殊”、“缩小剪刀差”，以及对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怀恋，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产物，是反动和落后的。

我也已经认识到：那些真正够得上称为“特权”的令人愤恨的现象，本是旧时代留下来的残污败垢，不能指望它们在一朝一夕就被荡涤干净。全国解放后，在一些阴暗的角落里，这群可恨的幽灵曾一度“借尸还魂”，腐蚀了我们的许多干部，引起部分人民的不满；但对全国全党来说，它们依然是少数，党从未给它们以容忍或合法的地位，并且一直对他们进行坚决斗争的。在目前，尽管仍有这种现象存在，但它们已逐步成为“过街老鼠”，绝之有日了。

近两年来，我阅读了一些反映旧时代生活面貌的文学作品与文史资料。它们告诉我：过去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分崩离析、腐败堕落、弱肉强食的残忍

而凄惨的地狱。其中的每一个事件的发展，每一个人物的遭遇，不是令人憎恨就是令人落泪。而今天，冷静地观察一下我们的生活，那就会明显地看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已面目皆非了。

诚然，我们连续好几年都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巨大灾难；但是道无饿殍，田园未荒，难关已经过去，形势日益好转。如果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大多数同志发扬了与人民生死与共的伟大革命传统，这是很难想象的。

诚然，我国人民当前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下，他们还有很多痛苦；但是比较起过去，他们已好得多了。我们从反动统治者的手中接过来的摊子是那样的既大又烂，惊人的贫乏而又芜杂。把它修葺得像现在这样的眉目清秀，已属非易；而又要同时把它建设得堂皇富丽起来，势必更加困难了。要根本摆脱贫困和痛苦，只有团结全国人民继续艰苦奋斗，继续支援和推动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并使其逐步取得胜利；否则只是空想。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明的有两点：第一，我没有把人吃人的社会中的特权现象和我们社会中的特权现象混为一谈。依我的陋见：“所谓”特权就是超越国家法律范围和社会道义准则的特别的权利。它会因社会制度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表现。在旧社会，依附权贵者可以在谋财害命后而逍遥法外，别人对他奈何不得。在我们的社会中，当然不可能有这等“特权”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某些人利用党和人民交给他们的职权，获取他们权利之外的厚赠却是常有的。我把这也叫着“特权”。这肯定会使人民不满，肯定对党不利，也是应该坚决反对的。过去我夸大了这种现象的严重性，误认为党对它还没有给予足够的警惕，从而忧心忡忡，愤慨埋怨，显然是错误的；但是，硬说我这就是把国民党匪帮和自己的党混为一谈，那也是无顾事实的。

第二，我没有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和某种程度的发展，而认为全党都已蜕化而不可收拾。否则，我就不会再想到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就不会对整风运动抱有热忱和希望。我过去所以会说出“这是特权”，这是“作威作福”等语，个性的因素是主要的；在看到了某些不良现象的时候，往往震怒愤慨，急不择言，根本没有考虑其是否符合实际，是否会有坏的影响。在给中央和毛主席写的那封信上，我所以又郑重其事地写下了“特权阶级的胚胎已经初步形成”的字句，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劲头在内。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促引”

党的领导重视这种现象。我哪能料到：这许多“惊人”之语不仅没有伤到我所希望伤到的那些人身上的一根毫毛，反而真地全部成了自己身上的“枷锁镣铐”；我赋予这些词儿的分量越重，回击到自己头上的重量也就越沉。这真可谓一出活报式的愚人自愚的悲喜剧！

对于“反右”运动，我一向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及时的，成绩也是巨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收效之良好愈来愈明显。遗憾的是：这也和其他激烈的斗争一样，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人。幸而，我们的党很快就发觉了这一点，并采取了适当的措施，纠正了或准备纠正若干偏误之处。这不能不是令人感怀和弥足珍贵的。目前，鉴于国际修正主义者的猖狂反叛和国内各种残余敌对分子的妄图作乱，这一工作可能已经停止。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并完全拥护。但是，我确信：这只是适应形势需要的暂时性的变化，而不是就此拉到；不管间断的时间将会如何地悠长，终有一天，泾渭应会分明的。

至于我个人，我一直承认我有过严重的错误，不说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还是作风意识上。我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也对不起受我牵害与影响的人。我将为此悔恨终身，并诚愿付出一切代价。然而，我又不能承认自己是个反党、反人民的分子和背弃神圣革命事业的叛徒。这不仅在我的过去，就是在我的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之际，以及在这几年来的方式奇特的劳动、生活的磨炼中，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内心世界的矛盾和斗争，以及日常对无数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爱憎之情与是非之论，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仍然这样认为：对待只有思想观点有错误而实无险恶用心的人，只要其没有任何的越轨行动，就不应该采用强制压服的方式，而应该从长计议，“辩论”斗争，批判，教育，说服，改造。关于这，我们的毛主席有过很多次极为明确的指示，伟大的导师列宁更以无数次的实例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多少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这样做的，都是顺利地，有效地；反之，则事半功倍（原文如此，应为事倍功半——整理者注），甚至适得其反。

古今所有革命的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恐怕都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拥有真理而又善良明智的人，对待与自己的观点不尽一致的伙伴，绝对不会首先挥舞拳头“或剑棒”，而总是依靠鲜明的真理、冷静的态度、确凿的事实，赢得对方的信服。因为他们充分地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和有力量的。从而他们有着无限的

信心，坚韧的毅力和灵活巧妙的方法，说得对方低头认错，和自己团结得更紧。

如果我的看法没有错，那么，党对像我这样的人，本是可以找到另种性质的方式进行教育改造的。

几年来，每当我感受到人格尊严的屈辱，家庭悲苦的煎熬，矛盾万千、无法解脱的时候，我就想要再给毛主席写封信。尽管我对他有过许多意见，可是我又觉得：除他而外，大概没有人能够脱我于水火了。我想向他倾诉我的一切想法和一切遭遇。我想告诉他：我的最主要的、最严重的错误观点，都是从“个人崇拜”所引起，对他本人的某些方面的认识发生了偏误所形成的，同时，又是在对他的不满中怀有希望与信赖，直接给他写的长信中集中地表达出来的。因而我要问：这是否也算做党和人民的敌人？如是，在我的愚妄的呼吁被遏止、偏激的情绪和态度被扭转之后，我诚实地承认了已经认识了的错误，但又同样诚实地承认：有些认识尚不稳定，有些问题尚未完全想通，希望党和同志们帮助我，这时，是否还算做敌人？如不是，那末，在近乎死亡的劳动磨练中及其以后，在没有任何人就事论事地帮助我消释模棱两可的观点及疑虑的情况下，我没有再固执己见，一直仰盼别人的明教，同时自个儿曲折迂回地摸索着前进，终于明确了方向，找到了真理，这时，是否仍然算作敌人？

根据毛主席历次关于处理政治思想问题的指示，根据他对评及在原则上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的态度，以及根据今天我对他的已经修正了的认识，我相信：毛主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几年来以至于今天的事实对我的回答可能是不一样的。人们可能会这样地讥笑我：说我是个白痴，说我也不舀碗清水把自己照照：有何能耐去麻烦毛主席？我自己也确实考虑到：区区我辈之微言，也很难上达领袖之耳。但是我坚信：只要他得悉一切，许多人的命运可能会改变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写。事到如今，我又觉得没有这种必要了，这是因为：

第一，新华社的许多老熟人都还在。我相信他们是了解我的，不仅熟知我的五官面貌，还能看透我的肝胆五脏。理智、良心人人有。只要时机成熟，必定水到渠成，的确无须去麻烦高级领导，虽然他是关怀每一个（人）的哀乐口温的。

第二，吃过一堑应长一智。过去的事已经过去。沉痛地吸取了往日之教训之后，应该目标正前方。不管过去有过何等的个人主义和其它形形色色的“主义”，但总地说来：我毕竟不是为了一己之名利温饱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的志愿依

然是为社会的进步做一点事。申诉也好，甄别也好，正面给毛主席写信也好，背后牢骚怪话也好，究其实，还不是为了吐“苦水”出“怨气”，使自己呼吸得舒畅些？党籍也罢，军籍也罢，职别待遇也罢，荣誉地位也罢，其恢复与否，或大小高低，与革命之得失又有何关系？想透了这一切，我的心情越来越平静了。

当然，我也不应该夸下这样的海口：今后不会再因为某种刺激而产生一丝一毫的苦恼。只要是个人，只要是个活人，只要是个富有正义感而又具有健全的良知与理智的活人，欢乐与苦恼总是会有的。不过，我以为自己找到了座右铭：“诚愿天下皆欢笑，个人饮泪苦亦甜！”只要当认为我还有可用之处，给我一份工作，我在尽力以赴之余，写写读读，教教孩子，何尝不是幸福？日后，如有战争，当复能信用于我，那对我来说，犹如一生二命了，即使肝脑涂地，亦会含笑于泉下。种种良好的愿望，早就具有，而决心之痛下，是近来的事。我将就此长往，义无反顾，以有进无退、一步不乱之足迹，印满余生之路。

我这一次又写了这许多，可又不能断定是否均妥善无误。如果偏谬或阐述未尽之处，我恳切地期望能够得到尽可能快的而又直接明了的指示。我一贯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能够本着追求真理、友爱相处的精神，披肝沥胆，赤诚相见，无所猜疑，无所隐讳；正确者，应肯定，错误者，应纠正；使每一个人既能情意舒畅，又能是非分明。这有利于同志，更有利于革命。如果说，当前我对党还有什么要求的话，也就仅此而已矣！

此致

敬礼！

戴 煌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版权声明】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